

汉口水塔担当都市地标

本刊第6期“阅城偶记”《皮子街点亮工业遗产》，在追寻“皮子街为何饱受厂商青睐”时，提及它有邻近宗关水厂的优势。巧的是汉镇既济水电公司1906年7月成立，着手兴建水厂和水塔，一下整整120年了。

1909年9月，宗关水厂开始送水，管网覆盖主城区，日供水近3万吨，供水人口达24万。汉口水塔同步启动，在全国时间最早、规模最大、高度最高。

传统农耕社会，城市地标往往是宝塔，北京北海白塔、西安大雁塔、开封铁塔、杭州六合塔、苏州虎丘塔、武昌洪山塔，无不耸立在市民旅人心中。进入工业时代，先进的公用设施异军突起，北京电报大楼、哈尔滨火车站、上海外白渡桥、广州白云机场夺了风骚，而汉口水塔以41.32米引领江城标高，直到1984年晴川饭店刷新天际线。

水塔修筑时一片荒野，但它一经昂起头来，看着天一阁消失，看着新市场、总商会、南洋大楼、江汉关崛起。一支自来水钢笔就是莫大的进步，何况一个自来水龙头？

1981年，水塔卸下供水、消防两大功能，一度“下海”开办商场，临街还加建裙楼黄金铺面，我中学一位老师来此开设“阳光一族”，率先刮起时尚快餐之风，最受情侣和孩童追捧。

当2016年地铁穿越中山大道，水塔又转型为城史博物馆，讲述它俯瞰的风云巨变——阳夏保卫战炮火擦身而过，抗日救亡献金车人头攒动，解放军部队入城足音铿锵……

水塔之水来自宗关水厂，它依傍汉水海关，自身也浇灌出一串地名：水厂路，水厂一路和二路，水厂上街和下街。我上过水厂路小学，妹妹上过水厂路中学，弟弟上过水厂技校。一个企业能派生出这么多名称，足以反观其历史影响。

“水厂公房”也是响亮的牌子，解放大道边有一处玲珑小院，两位小学女生家与自来水公司经理比邻而住，中间麻石甬道搁一张竹床，我们乐于围在一起做暑假作业。宗关消防队旁两栋老洋房更打眼，弟弟说它曾是高级职员的“大班房”，如今经过修缮留为一景。

宗关水厂老建筑保持完好。老公事房（办公楼）紧挨大门，两层连券柱廊欧式风格，在汉水堤边十分亮眼。老泵房连接沉淀池，外形典雅完全不像生产车间，2006年停用后辟为历史陈列馆。武汉解放前夕，白崇禧曾派兵前来破坏，地下党组织护厂队与之周旋，自来水安然流进新天地。

今天，武汉拥有12座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490万吨。水塔、泵房、公事房，号称武汉自来水的“三大宝”，2018年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2006年，水塔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宗关水厂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宗关水厂远望汉口水塔，携手造就出“宗关八景”——开元既济、众里寻塔、镜池飞渡、长虹卧波、回水曲径、长流听涛、紫藤密语、玉兰香樟……留住涓涓细流，传承城市记忆。

（简桦）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罗联峰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子渝 刘玉堂 刘庆平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张笃勤 陆永初
陈芳国 姚伟钧 涂文学 彭小华

编委会主任：陈诗亮

副主任：朱向梅 刘洪波 董菲
杨华 阮祥红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海涛 王军振 王四清 刘海燕
朱永利 李军 张智勇 李文洲
张冰峰 陈红英 林伟 胡蓉
唐云峰

主编：阮祥红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濛

编辑：刘玮 章旷怡

封面设计：王鹏

阅城偶记

<<< <

1 汉口水塔担当都市地标 / 简桦

时代年轮

<<< <

4 1966，武汉“7.16渡江节”诞生 / 陈晓桥

风雨同舟

<<< <

14 做职教路上的追光人 / 何琼

九城同心

<<< <

18 余叔岩：一派宗师传余韵
——罗田“三余”的百年京剧之路（三） / 王松平

委员天地

<<< <

26 珞珈山下，让信息“与人同行”
/ 姜婷婷（口述） 银华（整理）
30 一位钢城子弟的青山履职记 / 张新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商聚汉皋

<<< <

- 34 一块板材的实业长跑 / 丁 瑶 (口述) 侯艳芳 (整理)

人物述林

<<< <

- 38 吴石将军在武汉抗战中的著述 (上) / 邓正兵 任泰宇
43 倪季端: 鲜为人知的武汉中学创办人 / 戴剑华

都市寻踪

<<< <

- 47 中共中央在武汉三设长江局 / 刘 艾
53 向大戏靠拢: 从花鼓戏到楚剧 / 梁 方
58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 (九) / 刘宝森

往事漫忆

<<< <

- 62 我在汉正街长大 (三) / 李胜洪

主 管: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 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 《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 《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 CN42-1056/K

印 刷: 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每月 28 日

定 价: 8 元

地 址: 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 430010

电 话: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1966，武汉“7.16 渡江节”诞生

◇ 陈晓桥

轮印：60年——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在武汉畅游长江，武汉“7.16 渡江节”由此定名，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发展为国际横渡长江活动，成为江城走向世界的一大品牌。



武汉“7.16 渡江节”标识和吉祥物

毛泽东在武汉最后一次畅游长江

1966年7月16日，天气晴朗，武汉举行第11届渡江活动。上午8时，5000名游

泳健儿在武昌汉阳门江边等待下水。沿江两岸，飘扬的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欢腾的节日景象。

8时42分，几辆小轿车徐徐驶向武昌大堤口码头，毛泽东主席健步登上快艇，向大家微笑致意，然后站立船头准备检阅5000名渡江大军。

9时整，开幕式举行。武汉市副市长、渡江总指挥谢滋群致开幕词。他说，武汉市横渡长江游泳活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起来的。武汉市人民征服长江天堑的事实，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不管任何大风大浪，不管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

9时20分，武汉市副市长、副总指挥熊飞下达渡江令。顿时，武昌桥头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轮船汽笛齐鸣，岸上锣鼓震天，一齐为渡江健儿壮行。5000多名渡江健儿，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检阅渡江大军

有条不紊地按民兵班、排、连建制，在大江中破浪前进，场面极为壮观。

渡江大军中，有一支“小八路”游泳队，其中8岁小队员张雪涛和几个同学推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语录牌，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前进。游到长江与汉江汇合之处，他看到一艘快艇驶来，上面站着毛主席，不禁大声呼喊“毛主席来了！”“我看到毛主席啦！”

快艇上，毛泽东看到游泳健儿意气风发，兴奋地从这边走到那边，又从那边走到这边，向游泳大军挥手致意，200多名“小八路”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

上午10点半钟，游泳大军浩浩荡荡地渡过长江，抵达汉口终点。快艇驶向武昌大堤口附近，毛泽东顺着扶梯走下快艇，先在水中浸了一下，然后伸开双臂开始游泳。

汛期的长江，水流湍急，波涛滚滚。毛

泽东在浩瀚的江面上，时而挥臂侧游，劈开层层波浪，奋力向前；时而仰卧水面，头枕浪峰，展望万里长空；时而踩水前进，信步于万顷波涛之上，观赏两岸的壮丽风光。

毛泽东一边游泳，一边与周围人员交谈。看到身边一位女青年只会一种游泳姿势，便亲切地教她仰泳，并说：“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他还了解武汉青少年游泳活动的开展情况，询问三个人当中能不能有一个会游泳？周围的人一一作了回答，他听后满意地笑了。

12时许，辽阔的江面上刮起了5级南风，波涛更加汹涌。快艇赶紧向毛泽东靠拢，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再三劝毛泽东上船休息。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这里的省委第一书记，我听你的命令。”忽然，他问周围的人：“游了多长时间？”有人回答说：“45分钟了。”他意犹未尽：“还不到一小时嘛！”说完调转头继续向东游去。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的江面才登上快艇，历时1小时零5分。

毛泽东以73岁高龄畅游长江，7月25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在头版头条登载报道和照片，在全国掀起到大江大河游泳的热潮。

毛泽东畅游长江多少次，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12次，有的说13次，也有的说17次。原武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谢滋群，在他89岁高龄时，在自己的寓所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数字：“毛主席在武汉一共畅游了长江42次。”

这个数字准不准？记者查阅了武汉市公安局保卫部门的档案，结果记载的是43次，与谢老的记忆仅有1次之差。

那么，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次数，社会上的说法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悬殊呢？谢老

的回忆揭开了这个谜底。自1956年首次畅游长江,到1966年10年间,毛泽东每年都要来武汉游几次,多的时候一年要游五六次,但很多都是临时决定的。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少数几次公开,多数只有省市领导和公安保卫人员陪同,对外不作报道。

据《武汉市志·体育志》记载及媒体公开报道,毛泽东12次畅游长江的简况如下:

1956年5月31日14时许,毛泽东乘“武康”轮在武昌汉阳门码头入水,游至汉口谌家矶,游程1.3万米,历时2小时40分。江面二三级东南风,流速1.2—2米/秒。

1956年6月2日14时许,毛泽东从汉阳鹦鹉洲入水,穿过正在紧张施工的长江大桥2号和3号桥墩,游至青山八大家附近,游程2.4万米。江面二三级西南风,流速2.5米/秒,大桥桥墩流速3米/秒以上。

1956年6月3日下午,毛泽东从武昌平湖门码头入水,穿过正在施工的长江大桥7号和8号桥墩,游至青山任家路,游程2.25万米,历时1小时。江面三四级北风,下毛毛雨,流速3米/秒左右。

1957年9月5日17时,毛泽东乘船在长江大桥5号桥墩入水,游至汉口四维路江边,游程约7500米,历时30分。江面四级北风,浪大,流速3米/秒以上。

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巡视江南到达武汉当天,在长江畅游约20分钟。

1958年9月11日16时许,毛泽东到长江畅游37分钟,游程约1万米。水温为27℃。

1958年9月12日16时许,毛泽东乘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

船在长江大桥下江心入水,畅游30分钟,游程约1万米。水温28℃。

1958年9月13日午饭后,毛泽东预定下午视察武钢,到长江畅游20多分钟。

1958年9月14日17时许,毛泽东冒雨到长江畅游20分钟。

1961年9月24日17时许,毛泽东乘快艇到武昌造船厂码头江面入水,仰卧水面穿过大桥到长江汉水汇合处,逆水游了一段,然后游至汉口滨江公园,历时40多分钟,游程约1.2万米。

1962年6月24日16时许,毛泽东乘快艇到武昌造船厂码头江面入水,畅游30多分钟。

渡江活动从武汉走向全国

长江东去,汉水西来,地处两江交汇的武汉,市内江河纵横、湖港交织,江城人与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征服欲,玩水成为武汉人千百年来传统习俗。

武汉渡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武昌城下已有“善泅健儿结队成群，手执彩旗，出汉阳门，搏击长江”的盛况，两岸“观者如潮，欢声雷动”。近代以来，从清末军队泅渡训练、民国嬉水夺标，到1930年代出现全市性横渡竞赛。

1934年9月9日，武汉举办了首届横渡长江比赛，也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性横渡长江比赛。竞赛于当日下午一时举行，起点设在武昌黄鹄矶下的汉阳门码头，终点位于汉口三北码头，全程距离7500码（折合6858米）。比赛轰动三镇，“两岸观众约计三十万人”。

1935年7月，长江流域洪灾泛滥，汉江更是发生特大洪灾，长江水位上涨，导致汉阳大部分城区、汉口和武昌临江区域被淹达90天，直至入秋才渐渐退去。因此，第2届横渡长江竞赛于9月22日下午一时举行，受第一届带动，此次参赛人数明显增多，共有200多人参加，除警备旅士兵外，还有学生、机关职员等市民，最后到达终点的超过半数。

1936年8月举行第3届横渡长江比赛，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断。

武汉解放后，百废待举。1953年5月，

武汉市体委成立水上运动协会，主席宋如海，副主席由武汉几所大学的体育老师担任，曾动议组织武汉群众性渡江活动。

1956年5月，毛主席首次畅游长江写下《水调歌头·游泳》，其中“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情，对武汉举办渡江活动产生强大动力。武汉市委、市人委决定在6月举办解放后首届横渡长江活动，成立以副市长孙耀华为指挥长的指挥部，责成市体委会同市教育局、公安局和长航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方案。

6月初，武汉市体委对首届渡江活动作出安排，并决定由武汉水利学院体育教师黎树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体育教师吴子才、汉口协和医院女护士长晁新民三人试渡摸清水情，选定路线为武昌长江大桥（黄鹄矶头）至汉口滨江公园，全长5000米。7月9日，又组织50名运动员（包括女运动员）试渡，43人顺利到达终点。副市长孙耀华也亲自参加试渡到达终点，至此渡江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6月24日，武汉举行首届名为“支援解放台湾横渡长江竞赛”，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武汉市副



1934年，武汉第一届横渡长江比赛



市民刘昶收藏的1956、1997年渡江优胜奖章

市长孙耀华带头示范，作为省市党政领导第一次在武汉水域公开亮相，并与竞渡健儿一起顺利渡过长江。

首次渡江全力以赴，组织大批公安人员、民兵和医护人员，维持竞赛秩序，保障医疗救护。为了确保安全，每个运动员配备一条木划子救生，但指挥部只征用到400只远远不够，1958名运动员只得分批渡江，历时两天才完成竞赛。

1957年6月23日，武汉举行第2届渡江竞赛，7月7日又接着开展全国性渡江竞赛活动，由此从地方发展为全国性赛事。报名参赛的有上海、江苏、福建、广西和广州、长沙、武汉的93名运动员，其中女子24名。起点在武昌大堤口，终点在汉口三北码头。全程5000米。竞赛分四组进行，86人准确到达终点，成绩取前10名。男子组：广西队4人，广州队、上海队、福建队各2人。广西队夺得前三名，第一名李

细华成绩23分13秒。女子组：广州队3人，江苏队3人，广西、上海、武汉、长沙队各1人。广州队2人分获第1和第3名，第1名梁慧英成绩27分23秒。武汉队的晁新民以27分51秒夺得第2名。

1960年，武汉举行第5届渡江比赛。同时，举办长江沿岸12城市青少年横渡长江游泳友谊赛，分青年组和少年组。163名来自上海、南京、镇江、芜湖、安庆、九江、重庆、万县、武汉、黄石、沙市、宜昌的运动员参赛，126人到达终点（其中女子31人），成绩取前8名。武汉队的马振武夺得青年男子组第1名，成绩26分0秒1。南京队的李玉英夺得女子青年组第1名，成绩27分40秒4；少年男子组第1名为重庆队温家庆，成绩26分0秒5，少年女子组第1名是武汉队吴中秋，成绩30分14秒7。

上述两次全国性渡江比赛，虽然规模不大，参赛运动员不多，但圆满成功，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事实证明，武汉有能力举办全国性横渡长江竞赛，此后的每届都有外省市运动员参加。1971年第16届渡江活



1972年，武汉重型机床厂渡江人员合影



1993年9月2日，73岁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渡江

动，全国有22个省市自治区派出运动员参加，并且组成1个渡江方阵。外省市运动员参赛最多的是2015年第42届渡江节，共有1062人。

渡江活动上升为国际渡江节

武汉渡江活动发展为全国性赛事后，影响不断扩大，声誉传播海外，一些国际友人慕名前来参加渡江竞赛。1993年，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提升武汉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武汉市体委提请市委、市政府批准，首次尝试举办国际渡江节。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6年，奥运冠军伏明霞和丈夫梁锦松出席渡江活动

运动员前来参赛，组成一支“国际渡江方队”。从这一届开始，渡江活动冠名为“武汉国际横渡长江节”，中外选手一同在长江逐浪竞技，不少外国选手在“抢渡挑战赛”中取得佳绩。

2004年第31届，印度尼西亚选手 Albert C. Sutanto 获男子冠军，马来西亚选手 Dieung Anak Manggang 获亚军。

2005年第32届，德国选手本·马特斯获男子亚军。

2011年第38届，德国选手弗莱德获男子季军。

2014年第41届，德国选手戴克获男子亚军。

2015年第42届，瑞典选手西门、诺得斯明德分获男子冠军、季军；德国选手艾琳获女子冠军。

2019年第45届，瑞典选手克里斯提娜·艾克获女子亚军，瑞典选手克里斯托弗·耶德尔获得男子亚军。

据统计，1993年至2025年，德国、英国、委内瑞拉、美国、印尼、马来西亚、瑞典等15个国家的800人次选手，来武汉参加长江横渡和抢渡竞赛。

2025年第50届，6名外国选手在抢渡赛规定的20分钟内完赛。男选手中，俄罗斯索克洛夫斯基排名靠前，成绩12分29秒38。女选手中，英国杰西卡获第五名，成绩16分21秒04。同时，许多外国友人观摩和参加武汉渡江活动。

1957年第2届，援建武汉重型机床厂的两名苏联专家布罗维、阿特里，就与选手



2015年，瑞典选手西门·涂菲克获个人抢渡赛冠军

一起渡过长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黄太成和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成员，兴致勃勃观看了渡江活动。

1965年9月2日，日本青年文化代表团分乘两艘轮船，观看了武汉2000名青少年为他们进行的横渡长江联欢联谊活动。

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参加亚洲作家会议的各国和地区代表，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在郭沫若副委员长的陪同下，观看了第11届渡江活动。1972年，阿尔巴尼亚游泳队在领队巴赫里·阿泽来的带领下，参加了第17届渡江活动。1992年，8个国家的杂技高手会聚武汉，观看了第26届渡江活动。

担当“7.16全民游泳健身周”永久主会场

2014年6月，为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大力弘扬“7.16”精神和游泳文化，广泛推动亿万群众参与游泳运动提高健康水平，国家体育总局发起首个“7.16全民游泳健身周”

活动倡议，并决定将“7.16全民游泳健身周”永久主会场放到武汉。这源于伟人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产生的巨大影响，源于武汉把横渡长江活动办成了吸引全民参与游泳健身活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群众体育活动品牌。

2014年7月16日上午，以“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为主题的“中国·武汉第41届国际横渡长江活动暨抢渡长江挑战赛”开幕式在汉阳门举行。来自法国、德国等国外及全国各地的87名选手参加抢渡，而30个横渡方队2434人，遍及全国21个省区市的70个地区，参赛覆盖之广创下历史新高。30个横渡方队中，年龄最大的是杨高才（男）74岁，年龄最小的是刘婧（女）14岁，都编在山东方队中。每位成功横渡的选手都可获得一枚具有收藏价值的渡江节纪念牌。

个人抢渡赛中，江欢（武汉）以12分27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甲组第一名，博克（德国）、翁境伟（福建）分别夺得第二名、第



2015年6月25日，武汉“7.16全民游泳健身周”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三名；陈苏伟（广东）以15分11秒的成绩夺得男子乙组第一名，孙大革（广州）、张韬（杭州）分别夺得第二名、第三名；杨玥（云南）以14分11秒的成绩夺得女子组第一名，管若好（云南）、乔侨（北京）分别夺得第二名、第三名。

不少外国人参加横渡方队，其中山东方队有2名瑞典人，东湖高新方队、东风汽车方队各有1名法国人，北京方队有1名华裔美国人，中国移动方队有2名美籍华人。

2015年7月16日第42届拉开战幕，武汉迎来3590名中外游泳好手，其中湖北省外的城市单独组成10个方队共计千人，创下外地选手最多的历史纪录。抢渡赛从汉阳门下水，至南岸嘴起水，游程约1800米，被称为武汉横渡长江史上最难线路。这次抢渡赛群星云集，有前奥运会100米蝶泳冠军、瑞典选手拉尔斯·弗洛兰德，前奥运会100米蛙泳冠军罗雪娟，“亚洲蝶后”周雅菲等。最终，瑞典选手西门·涂菲克·万娜、德国选手艾琳·戴娜分获男、女组冠军，打破了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垄断格局。

2017年7月16日第43届，抢渡赛奖金增至两万美元，首次启用电子芯片计时系统。参加横渡的选手来自国内21个省区市，武汉以外的选手超过2000人。

2022年7月16日第47届，个人抢渡挑战赛参赛资格放宽，除运动员之外，符合条件的游泳爱好者也可报名参赛。当日，92名选手从汉阳大

禹神话园出发，以武昌长江观景第一台为终点，游程约2500米，比近几年线路的游程增加约700米。

2025年7月9日第50届，组委会对外发布渡江节纪念奖牌，其设计以“时间”为核心，采用独特的怀表结构，外层镂空江涛搭配时间刻度，呼应50周年历程；内层以50周年字体为主融入武汉地标、黄鹤与樱花元素，展现浓郁的江城风情。

武汉渡江活动浪花朵朵

晁新民一家17人“四世同堂”渡江。1956年，毛泽东畅游长江时，想邀请一些游泳高手参加。有人介绍了晁新民，说是5个孩子的母亲，游泳游得好。毛泽东一听，马上让人去请。副市长孙耀华派车到晁新民工作的医院，医院马上通知晁新民“有任务”。晁新民间“什么任务？”人事科同志说“不知道，只让你带上游泳衣”。晁新民匆匆准备一下就上了车，隐约感觉任务不寻常。此时，车上工作人员告诉她，是随同毛主席渡江。晁新民游泳的英姿和速度，给伟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次畅游后，毛泽东对随



1956年6月24日，晁新民荣获武汉市首届横渡长江竞赛亚军留影 / 儿子宋世安继承家风担任武汉冬泳协会主席

同人员说：“你们要向武汉医学院那名5个孩子的母亲学习！”

1996年，在77岁母亲晁新民的率领下，宋世安兄弟5人带10个儿子和1个孙子，举着“四世同堂”的牌子横渡长江，成为当年渡江节上最轰动的新闻。由于母亲的引领，宋世安很小就与水结下不解之缘，大着胆子到长江汉水游泳，1958年13岁时横渡长江曾获第18名。宋世安退休时，多家企业看中他的业务专长邀请去做“技术指导”，他一律谢绝而着手筹建冬泳协会，让更多人加入到渡江活动中来。2006年，在体育部门的支持下，武汉市游泳协会成立，“两江四岸”加盟的游泳团体超过30个，每个团体至少有40名会员，多的达数百人。宋世安为此付出很大努力，广受泳友称赞，推举他担任武汉冬泳协会主席。

台湾同胞体验畅游母亲河。2011年第38届，有一支21人的中华台北方队，不断唱着“高山青，涧水蓝……”，距起水点越来越远的时候，他们和岸上的观众一齐高喊“台北加油！湖北加油！”。中华台北成人游泳协会会长林自发高兴地说：“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横渡，有些害怕，也有些兴奋，昨



2011年，中华台北方队参加渡江节



江欢连续三届夺得个人抢渡赛第一名

晚一晚上都睡不着，很期待比赛的到来，不过今天总算是挑战成功了。”一位名叫张政护的选手深有感触地说：“长江可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啊！在这里游泳，感觉特别好。”

武汉体育学院学生江欢连续三届夺冠。长江水文情况复杂且每年有变化，拿到冠军不是易事，多次拿到冠军难度更大。2012年至2014年，江欢连续3届夺得抢渡挑战赛男子第一名。从他2012年第一次参赛看，两次试渡都拿下第一名，勇气和实力是根本。正式抢渡，他一直遥遥领先，并把优势保持到最后。上岸后，他对着大伙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在家门口比赛，我能获得冠军真的很高兴。”

曲艺名家陆鸣为赶渡江“打飞的”。武汉说唱团团长陆鸣，是武汉晚报方队的最佳啦啦队员。他的妻子杨鸣秋担任方队形象大使，每次参加渡江训练时，陆鸣义不容辞乐当“专车司机”。2015年渡江的前一天，陆鸣还身处外地。为了不耽误当“专车司

机”，当天凌晨1点“打飞的”赶回武汉，一大早开车将妻子送到方队集结处，再到终点三阳广场守候妻子登岸。当杨鸣秋成功登岸后，一群年轻人围着起哄“亲一个！亲一个！”陆鸣大方地与妻子相拥，满足大家的要求。

小伙子肖璇渡江成功后浪漫求婚。2015年第42届，武汉晚报组织一个方队共88名选手渡江，肖璇成功在终点三阳广场登岸后，演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求婚仪式。4位朋友穿着统一颜色的T恤，胸前各书一字组成“嫁给我吧”助阵，肖璇手捧鲜花和戒指向女友求婚。女友为这个不期而遇的惊喜激动得热泪盈眶，肖璇又弹奏吉他演唱《不弃不离》，将气氛推向高潮。

新闻人新生女儿取名“陈十游”。“陈十游”这个名字看上去像男士，却是一位女性，她就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在投资界相当有影响。为什么取了这个名字呢？这得从第10届渡江说起。1965年6月27日那天，长江日报编辑陈修诚陪同热爱游泳的夫人徐善岚到江边观看。夫人身怀六甲，突然感到肚子疼，赶紧将她送到二医院，晚上产下一个白胖胖的女儿。给女儿取什么名字呢？陈修诚拍板就叫“十游”。



陈十游与父母合影

有人问，一个女孩怎么叫这个名字，他说在第10届渡江活动时出生，叫这个名字不是很贴切、很有意义吗？



选手王武在后脑勺剪出“716”字样

房地产商王武发型剪出“716”。2012年渡江第一个方队登岸，出现一个新闻人物王武。他是一名57岁的房地产商，走在最前面，还沉浸在长江击水的快感中，嚷着“横渡长江，爽！”观众发现，他的后脑勺上剪出“716”，引起大家追看。他说每年的7月16日，都会和朋友们一起来渡江，所以特意剪出这样一个发型纪念。

2015年，“武汉渡江习俗”入选武汉市第五批非遗项目名录。武汉7.16渡江节，不仅是一场场劈波斩浪的体育盛会，更是一部流淌在长江之上的城市史诗，已成为展示武汉独特魅力和开放活力的重要窗口，是武汉走向世界的一张永恒的文化名片。

陈晓桥，武汉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体育局机关退休干部

做职教路上的追光人

◇ 何 琼

人物名片：何琼，民盟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未来交通学院院长。

我是一名民盟盟员，在职业教育这条路上走了三十多年。从普通教师到教授、高级技师，从讲台走向政协履职平台，也拿到了全国教材建设奖一等奖、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说实话，这些成绩离不开武汉的产业土壤——这里既是工业重镇，也是“光芯屏端网”的高地。党派和政协平台让我跳出学校看产业，也让我建言献策更有底气。

见证职教三十年：从低谷走向春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初登职教讲台。彼时，职业教育在社会认知中处于边缘位置，“差生才上职校”“职校毕业就是当工人”，

这些声音不绝于耳。1996年《职业教育法》颁布，职业教育终于确立了法律地位，但落实起来举步维艰。我所在的学校，实验设备陈旧，学生实习只能去工厂看师傅操作，自己很少有机会动手。更让我焦虑的是教学内容严重滞后，讲电子技术类课程还在用80年代的代码，芯片型号早已更新换代。

转折出现在2001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世界工厂”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井喷式增长。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湖北省和武汉市积极响应，整合资源做大做强职业院校。2006年，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在原武汉工交职业学院、武汉软件职业学院基础上合并组建，驶入发展快车道。我有幸成为这轮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真正让我感到职业教育春天的到来，是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次提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核心理念。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彻底扭转了社会认知。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职教与普教平起平坐。

作为亲历者，我见证了武汉从“职教大市”迈向“职教强市”的每一步：高职院校从零星几家发展到形成梯次，从保生存转向创特色，一批应用型本科开始招收职教高考学生。然而，与政策高歌猛进形成反差的是，职教教学中仍存在内容陈旧、产教融合不畅、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这促使我下定决心：不仅要站好讲台，更要为武汉职业教育发声。

深耕教学科研：用“一线素材”打造精品教材

高职院校大规模兴起于21世纪初。面临着“如何定位、如何培养产业所需的高技能人才、如何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等一系列破局难题，我深知教学改革改到深处是课程，于是选择从自己讲授的《可编程控制器技术》入手。当时智能制造风口初起，市面上几乎没有适合高职学生使用的教材，多是本科简化版，理论过多、内容陈旧、与岗位脱节。因此我给自己定下目标：编写一本真正“来源于企业、服务于教学、学生看得懂、企业用得上”的新形态教材。

担任专业教研室主任期间，我带领团队深入格力电器等二十余家企业，走进生产车间调研，及时梳理企业应用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装备，并引入教材。教材采用项目载体和任务驱动，通过具象化

的学习任务实现“做中学、做中教”，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与技能，有效提升了学习兴趣。

同时，我邀请相关领域的技能大师全程参与编写，负责把关真实项目案例和典型工作任务，着力凸显教材的实用性与针对性。我主编新形态、活页式等教材共17本，先后有5本入选“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在国内高职院校和企业培训中得到广泛应用。2025年，其中1本教材荣获全国教材建设奖优秀教材一等奖，该奖项是我国教材领域的最高荣誉，进一步印证了教材建设的实践成效。

这些成果不只是拿了奖。对我来说，更实在的收获是：跑企业跑得多了，我摸清了武汉产业的“家底”和“痛点”——什么岗位招不到人、哪种技术最吃香、企业到底怎么评价员工。这些“活情况”，后来全变成了我写提案的素材。

共建产业学院：从“一墙之隔”到“双向奔赴”

校企合作不深、产教融合不实，一直是职业教育的痛点。我们学校和大型央企烽火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就隔着一堵墙，但很长时间都没能真正合作起来。2019年，国家开始推行“1+X”证书试点。当时5G技术刚起步，我敏锐地瞄准了这个方向，一次次跑烽火通信的关键部门，跟他们讲“1+X”证书对企业 and 产业的长远好处，最终帮他们成功申报了试点。2020年9月，我们正式挂牌成立了烽火产业学院。

说实话，一开始还没想清楚具体要做什么，更没想到后面会绑得那么深。2021年3月，我们共同开发的“5G承载网络运



2022年，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颁奖现场

维”“1+X”证书正式获批。接下来一年多，我又主编了三本配套教材，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2022年，我带领学校团队与烽火技术专家联合研发的项目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实现了湖北省高职院校历史性突破。

随着合作越来越深入，烽火给我们捐赠的设备价值高达2000万元。那段时间正好赶上“一带一路”推进得很快，我听说烽火在印尼拿了个“村村通”项目，需要培训大量当地员工。于是，我们直接在印尼雅加达挂牌成立了烽火产业学院印尼培训中心，开发英文教材和课程，对烽火印尼员工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先后培养了470余名5G工程师。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23年6月，在全国教育数字化现场推进会上，教育部怀进鹏部长连线印尼培训现场，与受训的印尼学员交流，并对我们这个项目给予了充分肯定。当时我也在现场，心情非常激动。我主持的武软—烽火项目，由此成为学校产教融合一张靓丽的名片，获得了湖北省、武汉市主要领导的点赞，并摘得湖北省教学成果奖最高奖——特等奖。

当然，这些合作成果最终也落到了学生身上。我们和烽火共建了省级现场工程师培养项目，首批共91名学生。这些学生分学期在烽火学习6个月，每天接触的都是价值几个亿的设备，给他们授课的就是烽火的一线师傅。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全部进入烽火产业链工作，其中表现优秀的直接被录用，这是打破以前校招惯例的。

融入国家战略：为“技能武汉”鼓与呼

我当政协委员这些年，一直提醒自己：不能坐而论道，得解决真问题。我懂产业，也熟悉职教，所以盯得最多的就是“产教融合落地难”“技能人才待遇低”“职业认同感不强”，这些全是平时上课、跑企业时真正碰到的坎儿。

2022年，我提交了《关于打造职教品牌，推进我市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2023年，我又围绕职业教育改革、为制造强国培养产



2026年，做客武汉市两会直播间

业工人等主题继续呼吁。这些年，紧扣国家“新质生产力”战略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我针对“职业教育如何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校企合作如何深化”“双师型教师如何培养”等难点，做了不少调研。

其中一项调研成果《关于加大我市职业教育改革力度，提升技能人才培养水平的建议》，被推荐为民盟界别的市政协集体提案，并于2024年5月被民盟市委评为优秀调研成果。另一项建议《关于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我市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建议》，则接受了武汉电视台采访，其他新闻媒体也进行了广泛报道。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始终结合专业积累，推动职业教育对接国家战略和武汉“965”现代产业体系。在上述调研基础上，我依托民盟参政议政平台，进一步围绕职普融通、应用型本科与职业院校联动办学等方向深入研究，主持的《湖北省应用型本科与职业院校联动办学融合研究》课题，被立项为2025年度民盟湖北省委参政议政招标课题和民盟市委重点课题，研究报告中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此外，响应国家关于培育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部署，针对武汉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我带队调研了普宙科技、中信科移动等龙头企业，提交了《关于加强低空领域技能型人才培养，促进武汉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等提案，为新兴产业出谋划策。2025年，我被聘为市委统战部“武汉统一战线智库专家”；2026年3月，又荣获民盟武汉市委员会颁发的“2021-2025年度突出贡献奖”。

在立足武汉的同时，我也积极关注其他省份的产业发展需求，努力为更广泛的区域提供智力支持。例如，围绕沈阳制造业升级，



2023年6月，在民盟科技论坛与全国的盟员交流分享

我撰写了论文《推进沈阳智能制造业创新升级，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新突破》。该论文被民盟中央评为优秀论文，并在2023年民盟科技论坛上宣讲，与来自全国的盟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同时，这一成果也获评民盟湖北省委优秀调研成果。

从编教材到建产业学院，从站在讲台到坐在政协会议室，我越来越觉得，职业教育的每一步往前挪，既靠政策撑腰，也靠身边人帮忙。党派和政协让我的建议有了出口，各部门能真去落实。作为民盟盟员和市政协常委，我就一个笨办法：把一线听到的、看到的，变成能落地的建议，让产教融合在武汉扎下根。这事做好了，就是服务地方，也是给国家战略搭把手。

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跑过三镇的大街小巷，看过光谷的车流、车谷的厂房。这座城市从“钢的城”转向“光的城”，从“武汉制造”迈向“武汉智造”，背后得有一大批人才撑着。职业教育就是干这个的——给产业输送高技能人才。我愿意继续当那个“送人”的人，在政协说话，在一线干活。

余叔岩：一派宗师传余韵

——罗田“三余”的百年京剧之路（三）

◇ 王松平

天资毓秀，“小小余三胜”

余叔岩（1890—1943），名小云，谱名第祺，艺名“小小余三胜”，京剧著名老生，“余派”创始人，与杨小楼、梅兰芳在当时京剧界并称“三大贤”，又与马连良、高庆奎并称为京剧第三代“老生三杰”。

余叔岩出生时，余紫云已三十六岁。余叔岩自幼清秀聪慧，模仿力强，很早就会哼唱戏词，余紫云夫妇十分宠爱。余紫云本不愿子女都从事梨园行业，加之家中家境宽裕，便想培养他读书求仕。

当时，余紫云为大儿子余伯清请的教戏先生每日到家授课。年仅四五岁的余叔岩

在旁好奇观看，往往一句唱词听几遍便能学会。一次，先生把“起霸”示范数遍，余叔岩不自觉跟着模仿，一招一式、云手山膀、跨腿晃肩，皆有模有样。余伯清看后惊讶，连忙禀报父母。余紫云叫余叔岩到跟前，看他演示“起霸”，夫妇二人喜极而泣，紫云连连亲吻他的小脸，叹道：“看来这孩子还得吃演戏这碗饭！”

于是，余叔岩九岁时，余紫云将他送入姚增禄开办的小吉利科班，学习基本功和基础戏。姚增禄出身昆曲科班，先学小生，后改皮黄武生、老生，昆乱不挡，腿功尤佳，人称“姚一腿”。余叔岩先习短打武生，后学靠把武生，因天资聪颖，深得姚增禄赏识，悉心指导，受益良多。约两年后，余叔岩改



余叔岩

投吴连奎学习老生唱功。吴连奎是与谭鑫培同辈的著名老生演员。学习期间，余叔岩已在景泰园及南药王庙等处登台演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余紫云与谭鑫培合组福庆班，演出于西珠市口天和园。十三岁的余叔岩以“余小云”艺名登台，演出《战蒲关》《三娘教子》等戏。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四岁的余叔岩进入天津著名“德胜魁”班，住天津侯家后。每日清晨到西郊外十间房附近喊嗓、打把子，白天在周二宅胡同练功，常在天津、塘沽演出。他嗓音清亮，天赋出众，深受津、沽观众欢迎。又因祖父余三胜当年在天津享有盛誉，观众对他倍感亲切，称其为“小小余三胜”，该艺名由此扬名。他在此坐科、演出三年，名气飙升，誉满津沽。

据当年与余叔岩一同学戏练功的王庚生回忆：“在天津‘下天仙’演出时，余叔岩唱后中场，同台演出的还有著名演员孙菊仙、李吉瑞、尚和玉、九阵风（阎岚秋）等。‘小小余三胜’那时虽然还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可是表演上已经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在观众中博得了‘小神童’的美称。”

此后多年，余叔岩均以“小小余三胜”之名，常在京、津、开封等地演出。余叔岩十八岁左右“倒仓”，暂不能演出，便返回北京休养。其间，他应富户樊棣生邀请，参加其创办的“春阳友会”票友剧社。该社每月在崇文门外东大市浙慈会馆演出四场。一两年后，嗓音逐渐恢复，他也参加彩排，以演武生戏为主。

传承谭派，开创余派

民国元年（1912）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余叔岩因与其子袁克定友善，入总统府任随从武官，有时也在总统府内登台演出，还曾在总统府堂会中为谭鑫培配演《四郎探母》杨六郎。据传余叔岩武功甚好，《时报》载：“余叔岩曾在河南练兵，回京后曾得授文虎章。”是年冬，迎娶陈德霖之女陈淑铭为妻。

为进一步深造，民国四年（1915），二十六岁的余叔岩正式拜谭鑫培为师。谭鑫培为湖北江夏（今武昌）人，早年曾拜余三胜学戏。而在此之前，余叔岩已私淑谭派多年，具备相当功底。此时谭鑫培已届晚年，难以全面亲授，余叔岩便精心观摩其演出，每逢谭鑫培登台，必购票前往。有人问他何必买票，他说：“因为我是学戏，要选好座位，从各个角度看老师的表演。”他仔细揣摩，潜心钻研，遇有不明之处，再向老师请教。

民国六年（1917）谭鑫培去世后，由余叔岩承接谭派戏班。所演剧目，从唱腔到表演，无不贯通谭鑫培艺术精髓，成为“谭派”主要传人。但他宗谭而不泥谭，多有创新，尤其在人物塑造上狠下功夫，在发声、演唱、吐字、行腔上均有独创，时人称“新谭派”



余叔岩在《定军山》中饰黄忠

盟主。继而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个人艺术风格，创立影响深远的“余派”艺术。此后，生行竞相学余，“余派”成为当时老生行当的高峰，故有“以今日之须生而论，叔岩可谓铁中铮铮者”之誉。

余叔岩唱、做、念、打俱精。其嗓音虽不似洪亮，却与祖父余三胜相似，略带沙音，而音色清醇甜润，刚柔相济，别有韵味，如明月穿云，被誉为“云遮月”。他常与友人研究音韵，总结出“中锋嗓子”“三级韵”“提留音”等演唱技法，善用“立”音使声腔挺拔激越，常用“擞”音使旋律柔巧动听。他精于音律，讲究字音声韵，对口形开齐合撮、字音出声归韵、四声细致区分，皆有独到造诣。

尤为突出的是，他揣摩人物深入细致，善用唱腔表达人物情感。同是西皮慢板，《空城计》从容不迫、潇洒俊逸；《捉放曹》激越奔放、满腔愤懑。他的念白字字清晰，抑扬有致，注重语气衔接，以沉着稳重见长。

如《断臂说书》王佐大段念白，说到紧张处，不以急促取胜，而以节奏匀称、语气生动见长，不失儒雅风度。《杏林撷秀》评价其表演：

“轻倩合度，气宇超群，白雪阳春，调高响逸，如刘越石吹笛，悲壮苍凉，令人兴起；又如祢正平裸衣对客，作渔阳三挝，渊渊有金石声。每当筵前一曲，四座群倾……”

余叔岩做派细腻准确，身段工架优美，从生活真实出发，合乎戏情戏理，绝不单纯卖弄技巧，处处精致美观。如《打棍出箱》中，他的“踢鞋”“出箱”“夺棍”“甩发”等身段，起止合度，细致入微地表现出范仲禹时醒时迷的精神状态。其他如《当铜卖马》的耍铜、《镇潭州》的枪架子、《定军山》《阳平关》的躺马大刀下场、《定军山》《战太平》出征时的起霸与被擒时的扎靠、虎跳等，都被后学者奉为典范。

余叔岩文武兼长，昆乱不挡，戏路宽广。代表剧目有《战樊城》《长亭会》《鱼腹剑》《搜孤救孤》《盗宗卷》《汾河湾》《武家坡》《二进宫》《天雷报》《打侄上坟》《乌龙院》等数十出。他文学功底较好，对这些剧目的词句多有加工润色，还参与修改和创作剧本。

他的演出态度严肃，从不因观众多少而懈怠敷衍，也不刻意追求喝彩，以观众凝神欣赏为最佳效果。他反对同行相轻、互相排挤的陋习，倡导演出中通力合作、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

珠联璧合，家国同弦

民国十九年（1930）后，余叔岩因身体原因，一般不再进行营业演出，仅少量参加义务戏和堂会戏，但始终重视京剧理论研究、社会活动与授徒传艺。而在这些有限的



以“小小余三胜”之名演出《四郎探母》

舞台实践中，他与梅兰芳的多次搭档尤为引人注目——二人同为“三大贤”，艺术风格一刚一柔、相得益彰，合作剧目既具极高艺术水准，又饱含深厚社会意义，成为京剧黄金时代的经典写照。据《梨园史料》记载，余叔岩与梅兰芳的合作始于民国初年，巅峰时期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经典剧目包括《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四郎探母》《打渔杀家》等。

在《游龙戏凤》中，余叔岩饰演的正德皇帝，以余派特有的清醇嗓音与沉稳身段，塑造出帝王的洒脱与痴情；梅兰芳饰演的李凤姐，娇俏灵动、唱腔婉转，二人一庄一谐、配合默契，将君臣相遇的诙谐与情愫演绎得淋漓尽致。演出时，余叔岩的念白字字珠玑、节奏精准，与梅兰芳的台步、水袖衔接得天衣无缝，台下常出现“满堂彩”连缀的盛况。《梅兰芳回忆录》第四章“我和余叔岩合作时期”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老观众

曾对谭鑫培、余叔岩做出这样的评价，他说：‘叔岩演正德，年龄、扮相都比谭老占优势，同时，经过细致的排练琢磨，对这个风流天子的神情笑貌，描摹逼真，《戏凤》这个戏应该说是青胜于蓝。’”而在《四郎探母》中，余叔岩饰杨延辉，梅兰芳饰铁镜公主，“坐宫”一折的对唱堪称传世经典——余派的苍凉醇厚与梅派的甜润清亮交织，既深刻展现人物的思乡之痛，又细腻凸显夫妻间的温情，成为后世演绎该剧的标杆范本。

尤为难得的是，二人在艺术上相互成就。余叔岩的严谨唱腔与细腻做派，为梅兰芳的身段表演提供了坚实的节奏支撑；梅兰芳的创新理念也反哺于余叔岩，使其在人物情感表达上更趋细腻动人。1931年，为赈济长江流域等地水灾，二人联合杨小楼等名家演出义务戏《霸王别姬》（杨小楼饰项羽，梅兰芳饰虞姬），余叔岩则压轴出演《游龙戏凤》中的正德皇帝，这场演出不仅创下当时票房纪录，更成为京剧史上“名家合璧、义演赈灾”的典范，彰显了梨园界的家国情怀。



余叔岩在《洗浮山》中饰演贺天保

次年（1932），他与梅兰芳联合齐如山、张伯驹等发起组织的“国剧学会”正式运作，该学会此前已于1931年12月在北京虎坊桥成立，其时京剧已成为全国性剧种，故称国剧。参加学会的有社会名流、业余京剧爱好者、京剧及昆剧艺人等。学会附设“国剧传习所”，招收学员70余人，北大教授刘半农、戏曲理论家徐凌霄等常为学员授课。

他还与张伯驹合编《乱弹音韵辑要》，作为传习所音韵教材，并在国剧学会主讲京剧老生表演法则，从多方面总结其表演理念。

民国二十四年（1935），湖北发生水灾，余叔岩身为湖北罗田人，心系家乡，带病在京开明戏院义务演出《问樵闹府》《打棍出箱》，还与梅兰芳再度携手，合作经典剧目《汾河湾》传递赈灾心意，又在怀仁堂演出《群英会》等剧。次年7月，他参与组织成立“北平梨园公会”，与梅兰芳等十五人被选为董事。

被周恩来总理评价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一生坎坷，颇具传奇，始终喜爱京剧，尤其钟爱余叔岩的演唱。张学良曾对人说：“一次在天津听余叔岩的《卖马》，由上场到耍锏，一直闭着眼睛。黄腔味儿！当时我就知道他在放份儿，放得比老谭（谭鑫培）还足。”

还有一次，谈到京剧演员要与台下观众共鸣时，张学良说：“一次在吉祥戏院听余叔岩的《张绣刺婶》，宛城大战真把我的抗日劲头勾得十足！他在台上，我在台下，



余叔岩与梅兰芳

心里的节奏是扣在一个板上！”张学良将自己的抗日情怀与余叔岩的演出融为一体，从这一意义上说，余叔岩的演出也承载了一份民族大义的精神力量。

余音绕梁，余脉绵长

在京剧史上，余叔岩是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他成名后，先后在百代、高亭、长城、国乐等唱片公司灌制三十七面唱片（俗称“十八张半”）。这些唱片虽未包括“反二簧”，但几乎囊括京剧各种板式唱腔，成为后世学习“余派”艺术的圭臬与范本，影响深远，堪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可与书法史上的“颜筋柳骨”相媲美。

另据黄正勤《张学良谈余叔岩》一文披露：1932年，余叔岩曾为张学良特灌十张唱片，灌制后便砸毁母版，成为独一无二的绝版，堪称一级国宝。据传张学良去世后，家人将这些唱片随葬，具体剧目现已无从考证。另有资料记载，余叔岩为灌制这批唱片

筹备五十余天，精心调理身体、打磨唱腔，并严禁友人旁听，灌制后特意叮嘱不留母版。当时有人不解，甚至误解他自视甚高，然此举一生仅此一次，其用心之深，非常人所能理解。

一代伟人毛泽东也十分喜爱中华戏曲，对余叔岩的演唱评价很高。《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著名作家萧军对京剧艺术造诣颇深，曾演出《打渔杀家》《二堂舍子》等剧。据其子萧鸣回忆，萧军多次对他讲，毛泽东在延安时常同他讨论京剧，并说：“我很喜欢听余叔岩先生唱的段子，很有特色，剧目也好……”毛泽东在延安收集了许多京剧唱片，其中就有余叔岩的《搜孤救孤》，因反复聆听，唱片音质已近失真。

余叔岩居家休养期间，以课徒为乐，以传承艺业为己任。他的弟子，即“余派”主要传人，有“三小四少”之说：“三小”指孟小冬、杨宝忠（小小朵）、谭富英（小小谭）；“四少”指李少春、王少楼、吴彦衡（吴少霞）、陈少霖，马连良等亦深受其影响。此外，伶、票两界仰慕“余派”者甚多，如李适可、张伯驹、赵贯一等人均得其教益，其中以伶界孟小冬、票界张伯驹受教最多。

余叔岩收孟小冬为徒后，精心传授《失街亭》《洪羊洞》《法场换子》等十余出大戏。一次孟小冬演《失街亭》，余叔岩在台后把场。演出结束卸装时，有友人对孟小冬说：“你在‘斩谿’时怒目瞪眼，白眼珠露出太多，不好看。”孟小冬立即请教余叔岩，余叔岩随口指点：“记住，瞪眼别忘拧眉，你试试。”孟小冬对镜练习，果然效果大为改观。

赵贯一等人曾说，常见余叔岩强忍病痛，捂着肚子为孟小冬说戏，令人感动心疼。所幸孟小冬不负师望，终成“余派”最重要的传人之一。

余叔岩除授徒与撰写戏曲研究文章外，多寄情于书法。他先学米芾，后习乾隆帝师张得天之笔意，其书法存世不多。据传尚有一幅书画扇面，收藏于常州博物馆。

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家，绘画、书法、篆刻、诗词无所不通，尤精山水，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一大千”。张大千兴趣广泛，亦酷爱京剧艺术。1925年，张大千结识余叔岩，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二人常一同赴宴，最爱去春华楼。每次前往，几乎不用点菜，全由掌柜白永吉安排。张大千赞其菜“要得”，余叔岩亦称“行”。当时北京有“唱不过余叔岩，画不过张大千，吃不过白永吉”之说，赞三人各怀绝技。

张大千曾将一幅与张善子合作的《丹山玉虎图》赠予余叔岩，还与余叔岩合作扇面《荷香益远》：正面为张大千绘荷池荷花，反面为余叔岩书：“山清气爽九秋天，黄菊红茱满泛船。千里结言宁有后，群贤毕至猥居前。杜郎闲客今焉是，谢守风流古所传。独把秋英缘底事，老来情味向诗偏。”此画曾在2010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亮相，由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主槌，以201600元人民币成交。

民国三十年（1941），余叔岩血病加剧，经德国医院诊断为膀胱癌，手术后一度好转。次年癌细胞扩散，改由协和医院治疗。据吴小如《说余派补》披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医学专家撤离北平，余叔岩病情危急，却坚决拒绝接受日本医生诊治，一拖再拖，终至不起。《学林漫录》亦称：“叔岩在京津沦陷后还是非常爱国的，他的病和死也与当时处境和条件不无关系。”可见他宁死不向日寇求医的民族气节。

民国三十二年（1943）5月19日，余



与弟子李少春（左）、孟小冬（右）合影

叔岩病逝，终年五十四岁。逝世后，先移灵法源寺停灵，农历十月十五，灵柩迁往北京永定门外余氏祖茔下葬，后迁至福田公墓。

余叔岩虽逝，余音绕梁。后人评价：京剧老生发展史上，有数位里程碑式人物——余三胜、程长庚被奉为京剧老生开山之祖；谭鑫培是京剧成熟期老生代表；而余叔岩，则是京剧老生艺术的集大成者，承前启后，为后世圭臬，标志着京剧老生进入新的时代。

尽管余叔岩的一生比较短暂，享年仅五十四岁，舞台生涯不足三十年，但其在京剧老生艺术上的影响，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近百年，并将继续传承下去。他以半生心血潜心研究京剧老生艺术，成就卓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老生演员。京剧大师杨宝森曾说过：“余三爷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戏曲人物形象，真是光彩照人，美不胜收。……人生有限也无限，至今没有人超过

余大贤，他的生命力仍存在，仍在领导着京剧老生行。”

余叔岩所创立的余派艺术影响深远，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杨派（杨宝森）、李派（李少春）等流派，目前仍是京剧老生行当的主打流派之一。据报道，现代京剧样板戏及许多新编京剧的唱腔，仍多宗法余叔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童祥苓，他没有拜过余叔岩为师，余叔岩病逝时，只有八岁，但他痴迷余派，从“十八张半”唱片中学余叔岩的唱腔，领悟余派要领，他用余叔岩的“三音”（即从罗田畈腔、东腔中提炼出来的立音、擞音、坎音）唱法，成功演绎了影响一代人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英雄形象。业内人士曾评价，童祥苓如果不用余派唱法饰演杨子荣，是达不到如此效果的。

“三余”故里，国粹寻根

如今，余门祖孙三代的业绩均被载入《辞海》《辞源》等大型文献书籍之中。这不仅是罗田的文化名人、罗田含金量最高的名片，更是湖北乃至中国的名人与文化名片。罗田作为“三余”的故里，县委、县政府从2012年开始，积极推进文化强县建设，着力实施以“京剧三余”为重点的名人文化建设工程，成立了余三胜京剧艺术研究会、余三胜剧社、京剧票友俱乐部，建设了余三胜广场、竖立了京剧鼻祖余三胜的塑像，开展了京剧进校园活动，创作上演的大型戏曲《余三胜轶事》，唱到了北京，唱响全国。

2023年7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王勇，《中国京剧》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创作和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正贵等一行7人到罗田开展了为期三天的“寻根”之旅。王勇

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绚烂的夏日，来到罗田学习调研，这是国家京剧院京剧人的一次‘寻根’之旅，是向前辈先贤的‘朝圣’之旅。在吹响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新号角的使命感感召下，也激起我们京剧人思考一个问题：京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京剧从千年古县罗田来，从京剧‘三鼎甲’之一的余三胜而来，从一代京剧旦角大师余紫云和京剧余派创始人余叔岩而来，从历代京剧艺术先贤前辈的奋斗实践中而来。寻根是为了守正，守正是为了创新。守正创新，就是为了让京剧更好地世代传承和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国家京剧院与罗田县人民政府关于央地共建京剧余派艺术传承基地签约仪式在罗田举行。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央地共建合作意向，旨在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国粹艺术，支持地方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按照央地共建思路，国家京剧院将支持罗田县打造京剧小镇，在罗田设立国家京剧院创作基地、研究基地，召开余三胜和余派艺术研讨会，设置《中国京剧》专刊专栏研讨相关艺术，设立京剧考级点，举办京剧艺术票友节，推动京剧文化元素与罗田文化旅游事业深度融合等系列项目。

同年10月11日，“余三胜和余（叔岩）派艺术学术研讨会”在罗田召开。100多位来自全国的京剧名流大家、专家学者、院团负责人和票友齐聚一堂，围绕“京剧的守正与创新”主题开展理论研讨，并为“国家京剧院创作基地”“罗田县余三胜京剧团”等授牌、揭牌。同时，国家京剧院青年团的演员们为老区群众献上《五女拜寿》和余派老生折子戏等精彩剧目。笔者有幸参加了此次研讨活动，并观看了演出。

2024年3月23日，国家一级演员、京剧余（叔岩）派老生行当第四代传人王珮瑜

率少儿京剧团“瑜音小社”师生来到罗田，拜访余三胜故里，参观余三胜故居纪念馆，在三胜广场前拜谒余三胜雕像，缅怀余派先贤，并开展了一系列京剧教育公益行动。在活动现场，王珮瑜满怀喜悦地说：“来到罗田，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京剧鼻祖家乡的魅力……”

2025年11月4日，国家京剧院又在罗田召开了“纪念余叔岩诞辰135周年暨京剧‘三余’学术研讨会”，全国政协京昆室副主任、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宣布：国家京剧院将与罗田县合作创排一部反映京剧奠基人余三胜艺术生涯的大型京剧，共同把罗田打造成国粹研习中心和戏迷心中的京剧“朝圣之地”。

在不久的将来，罗田必将建设成为全国京剧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全国“写戏、唱戏、演戏、看戏、评戏”的“戏码头”，吸引所有京剧人和京剧知音齐聚罗田，践行京剧之旅、文化之旅、精神之旅，推动罗田全域文旅事业和乡村振兴高质量飞跃发展。

王松平，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罗田县文化馆退休职工

珞珈山下，让信息“与人同行”

◇ 姜婷婷（口述） 银 华（整理）

人物名片：姜婷婷，市政协常委，武汉知联会副会长，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信息技术一直在迭代，从搜索引擎到社交媒体，从推荐算法到生成式 AI，但有一个现象越来越明显：信息越丰富，人的选择反而越窄；算法越智能，人的自主性反而越弱。信息茧房、信息焦虑、信息成瘾等问题层出不穷，这些不是技术故障，而是关系失衡。我们这个学科的使命，其实就是把信息的控制权尽可能交回到人手里，让信息为人所用，而不是让人被信息所困。

2022 年，我们的一级学科正式由“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这个学科已走过百余年历程，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内涵，但其核心始终没变——我们关注的是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

从珞珈山到珞珈山

我是武汉人，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1999 年考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就读

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当时这还是一个全新的专业，我的选择也纯属偶然，甚至对学院在学术界的引领地位一无所知。印象最深的，是专业宣传册上的那句“文理兼修”。或许那个时候，武大的历史底蕴和珞珈山的四季风物，对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吸引力。

入学后，我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本科阶段，我学习了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系统等专业课程，同时也大量接触到了管理学和计算机技术方面的知识，逐渐领会这个专业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怎么才能让人在需要信息的时候找到它？这个问题看似简单，背后却涉及到分类、标引、用户行为和系统设计这一整套复杂的理论和技术。硕士阶段，我开始在导师的指导下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他当时对我强调的两个词，至今影响着我：一个是“秩序”，让无序的信息变得有序，这是我们的研究内容；另一个是“价值”，信息是为人服务的，这是我们的研究目标。

我很感谢硕士导师，他让我看到自己身

上的科研潜力，也鼓励我走出去，去看看当时世界上这个领域最前沿的地方在做些什么。于是在2005年，我做出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去美国留学读博士。当时选择了位于美国宾州的匹兹堡大学，它的图书情报专业排名一直位居全美前三。当然，匹兹堡这个城市也有它独特的亲切感，除了是武汉的姐妹城市，也是钢铁城市，还有相似的河流交汇地形。



从匹兹堡大学博士毕业

美国的博士教育是“宽进严出”，采取的是淘汰制，一路要经过初级考试、综合考试、学位论文开题和答辩，每道关卡都会有一些同学止步。在替他们惋惜的同时，我也不断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好的导师，做的课题是关于信息搜寻和信息可视化，不仅有意思，还很有前景。导师是加拿大人，毕业于著名的麦吉尔大学，令我意外的是她早年是学音乐的，身上透出深厚的人文精神。这些东西后来也影响了我，让我慢慢明白自己为什么喜欢做研究，做研究不只是用方法解决具体问题，更是要对人有关怀，对世界有好奇。

整个博士学习期间还算是顺利的，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导师的身体出了问题。记得我参加初级考试时，第一次面对整个学术委员会，心里很有些忐忑。那时导师刚做完一次大手术，以她的身体状况应该是不能出席的，可我一进教室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了我的名字，导师拄着拐杖向我招手，那一刻我特别感动，在接下来的答辩中信心倍增，表现出色。后来她身体恢复的不错，又带着我一起钻研最新的课题，去学术会议上展示我们的研究发现，度过了一段辛苦但

成就感满满的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离开美国后她因病情恶化去世了，但她送给我的一个匹兹堡大学的照片相框，一直放在我的书桌案头。

对于学成回国的选择，我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犹豫。回想当初出国本就是想得到不一样的学术经历和人生体验，又恰巧毕业前在四大见到武大的海外人才招聘团，其中就有母院的院长。从他口里得知信管院为引进人才准备的广阔舞台，在他眼里我还看到那种求贤若渴的真诚，就好像父母对孩子回家的盼望。

2011年，我正式入职武大信管院。中外学术体系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工作的前几年也少不了磕磕绊绊，所幸学校和学院都能够充分尊重海归青年学者的科研诉求，这让我有了坚守初心的底气。这些年来，比职称和头衔更让我踏实的，是重新走在珞珈山下的那种归属感。

亲历武大信管学科发展

回国后的研究一直扎根于信息行为领域。早期研究搜索引擎上的主动信息搜寻行

为，比如在百度上搜索会用什么关键词，会点哪个结果，会怎么评价信息的相关性？后来社交媒体兴起，我们开始关注被动的信息偶遇行为——本来没想找这个东西，但它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你被吸引了。再后来是信息规避行为——明明可以获得的信息，你却有意不去看，比如令人焦虑的消息、跟你观点冲突的信息。

大概从2018年开始，我们重点研究“信息茧房”问题。这个现象其实很多人都能感觉到：刷短视频时，平台一直给你推喜欢的类型，你越看越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平台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它的商业逻辑就是留住用户的时间，让人上瘾甚至消费，久而久之，用户就被困在偏好里，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我们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干预手段，例如多感官设计、示能性设计等，核心在于通过影响用户的心理来引导积极的行为改变。

这些研究不仅获得了学界的认可，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去年央视《共同关注》栏目有一期关于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的专题报道，我很有幸受邀在专家采访中向公众解释了信息茧房的形成机制和应对策略。今年我们又根据中央网信办的要求继续深化信息茧房治理的研究，既要从平台端规范算法，也要从用户端提升算法素养。我深深感受到，学者不能把自己困在象牙塔里，而要瞄准“真问题”，做好“真研究”。

现在我们团队的研究重心转向了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智交互。2022年，我和iSchool联盟的主席共同发起成立武汉大学人智交互国际联合研究中心，面向分析式AI（个性化推荐）、生成式AI（语言大模型）和具身式AI（机器人）开展系统的人智交互研究。为了支撑这些研究，我们去年建成

了具身认知与体验测量实验空间，配置了先进的动作、表情捕捉以及眼动追踪、脑电成像、近红外脑功能成像的设备，这个实验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内外同行中是领先的。

也是得益于这个实验空间，我们这几年做的应用研究也形成了一些能够落地的科技转化成果。最让人骄傲的是跟城市设计学院、机器人学院合作完成的“五指灵巧手”获得武大历史上的首个红点奖，这是全球三大设计奖项之一。我们还为机器人学院的下肢外骨骼机器人配套开发了一个VR康复助手系统，能够像康复治疗师一样带着病人做腿部康复训练，尤其是通过游戏化的交互机制让病人觉得自己是在旅游景点里行走，大大提升了康复训练的动机和效果。

我们学院不仅有领航掌舵的学术大家，也有有追求、够努力的青年学者，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光发热。让人倍感振奋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武大的信息管理学科在QS排名中排到了全球前十。我们从老一辈人手中接过治学和育人的火种，如今再传递给一届又一届的年轻学子，正是这种传承让我们学科在人工智能浪潮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行走在校园和城市之间

我常常想起博士导师说的话，她说做研究不能只问“怎么做的”，还要问“为什么做”和“有什么用”。这句话我现在也经常跟学生讲。你做一个研究，如果只是把论文写得很漂亮，没有解决任何现实问题，那它最大的价值可能就是让你能毕业。但如果你的研究能够让一个政策制定者知道信息茧房的危害，让一个普通用户知道怎么冲破推荐算法的包围，那它的价值就是服务社会、



姜婷婷研究团队师生合影

改变世界，这个贡献可能是微小的，但是积跬步才能至千里。

十几年来我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将近60人。在与学生的相处中，我一直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平等相待”，在研究中对逻辑的反复推敲、对细节的精益求精，还有对学术规范问题的零容忍，学生平时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我特别享受跟学生一起探讨交流的时光，总是鼓励他们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也从学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年轻人对短视频的敏感度比我高得多，他们能告诉我哪个平台的推荐算法最“粘人”，这些信息对我来说就是研究素材。

除了教学科研，我还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既是武汉知识分子联谊会的副会长，也是市政协常委。在政协这个平台上，我每年都会开展实地调研，基于客观数据研究写提案。2025年的提案是关于“发展图书馆旅游，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起因是有一次我去天津出差，顺便去了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发现那里周末人满为患，很多年轻人不是去看书的，是去拍照打卡的。我觉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回来就跟学生一起扒取网上的评论数据并进行文本挖掘，发现全国有不少图书

馆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我就在提案里建议武汉市文旅局把一些有特色的公共图书馆纳入旅游线路，比如青山区图书馆、东西湖区图书馆，既带动客流，也能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

高校学者和政协委员的双重身份让我意识到，要做“接地气”的研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的实施、加快建设数智经济一线城市是武汉的重要发展战略。近几年我从武汉城市发展中的痛点触发，对智慧城市服务体系、企业数智化转型、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的就业保障、智慧旅游、智慧政务等方面提出咨政建议，多项获得省部级部门采纳，还在《国家治理》、人民论坛网上发表了相关观点。过往的履职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信息是一种资源，让这种资源公平、高效地服务于社会，正是我们这代信息资源管理学者的责任。

从珞珈山下的懵懂少年，到远渡重洋的求知者，再到反哺母校的教育科研工作者，这一路我争取把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信息资源管理这门学科，正处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它承载着服务国家战略、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使命。未来，我希望继续在珞珈山下，推动信息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于时代，也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这项事业中。

一位钢城子弟的青山履职记

◇ 张 新

人物名片：张新，青山区政协委员，高级工程师，武钢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科技与信息化总监，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智能制造专家组成员。

2000年7月，我从武汉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背着一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走进了武钢程控交换机房的大门。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条从青山红钢城出发之路，一走就是二十多年，一直从机房的夜班值守走到政协会议的建言席。

技术立身，在机房写下第一行代码

我是土生土长的青山人，父母在武钢的炉火旁奉献了一生，我也在钢城的烟尘与汽笛声中长大，骨子里浸透了这座老工业基地的厚重与坚韧。年轻时也曾憧憬过北上广

深的繁华，但毕业时还是毫不犹豫地回到这里，青山这片工业热土养育了我，我理应为她燃烧自己的光与热。

刚进厂的日子，是在机房倒班中度过的。90年代武钢建成武汉市第一个程控电话交换数据局，我进厂时，已全面升级为国产第二代程控交换系统。深夜的机房，只有设备运转的嗡鸣和显示器幽蓝的光，我常常守着那些闪烁的指示灯，一直守到天亮。那时的青山区，武钢职工的生活区与生产区紧紧交织在一起，清晨的广播、傍晚的班车、夜晚的灯火，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工业社会图景。我暗下决心：既然选择了留下，就要在这里干出一番名堂。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1年至2005年间。那几年国内宽带互联网开始普及，武钢也面临着生产网络与职工居民生活区网络升级改造的迫切需求。我参与了整个青山区

武钢职工居民生活区的民用宽带网络建设，同时接到一个任务：开发面向企业及居民的“武钢在线”网站，提供流媒体服务。

公司原本打算引进国内某厂商的产品，但我在部署调试过程中发现，那套产品的性能存在明显瓶颈，而且架构僵化，难以满足我们实际业务场景的需求。基于此，我把自己关在机房里整整两周，用 C++ 和 Java 写了一套后台服务软件，从并发处理到缓存机制，从流媒体传输到负载均衡，全部自主设计实现并部署到了 Linux 系统上。

在两套系统的运行对比之下，单位最终放弃了原本的商业产品采购方案，转而采用了我自主开发的系统。系统上线后运行稳定，用户评价很好，带动了公司网络服务业务的稳步上升，在青山区也形成了良好的口碑。那一年，我获得了公司年度技术创新能手称号，还代表公司参加省里的职工岗位自主创新成果竞赛，捧回二等奖。站在领奖台上，年轻的我在聚光灯下激动得手心冒汗。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核心技术是求不来、买不来的，唯有自主创新，才能真正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这个信念，后来贯穿了我 26 年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重大项目。

带队攻坚，在项目中磨出一支队伍

此后数年，我从开发员逐步成长为班长、主管、部长、副主任、主任，从武钢工程技术集团通信公司的工程师，成长为应用研发中心的负责人，获评高级工程师职称。身份变了，责任重了，但最让我难忘的，不是那些总投资数亿元的项目，而是我亲手带出来的那支队伍。

2011 年，我担任应用研发中心主任时，面临的是一个艰难的局面：没有人才储备，

没有技术队伍，却要开辟全新的智慧软件综合解决方案服务产业。我积极向公司建议招聘新人，IT 行业竞争激烈，央企的薪酬待遇对优秀的应届本硕毕业生吸引力有限，愿意来的男性更是少之又少。最终，我的团队女性比例接近 60%，这在当时的 IT 行业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没想到的是，这支“娘子军”工作能力非常出色，后来给了我最大的惊喜。

技术团队不能只靠 KPI 和加班来维系，人心需要温度，团队需要文化。作为党支部书记，我在抓业务的同时，也用心做着党建工作。我是个传统文化爱好者，平时爱读史书，硬笔书法练了多年，喜爱汉服，甚至自学了古琴。工余时间，我会在团队活动中穿插讲授传统文化，从《论语》中的管理智慧到汉服衣冠的礼制内涵，从古琴曲《流水》的意境到书法中的动静之道。起初这群年轻人只是好奇，后来竟渐渐入了迷，纷纷加入其中。

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是我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大家自编自导拍摄的团队网络春晚。每年春节前，我们利用周末和晚上排练，写剧本、借设备、拍视频，然后发布到网络平台上。每年春节，回家过年的员工在网上看到自己表演的节目，评论区里一片欢腾。后来，这支团队的名气越来越大，武钢集团工会将其评为集团公司级优秀团队，并向上推荐获评中央企业巾帼团队称号。这些年轻人在团队中找到了归属感，也找到了事业的奔头。

多年后，当我离开团队升任武钢集团总部管理岗位，我依然怀念那段共同打拼的岁月。团队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靠一点一滴的信任积累，才能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合力。

2010 年到 2018 年，我先后主持和参与



作者与团队青年员工交流古琴等传统文化

了多个武钢集团及外部的重大信息化项目，每个项目都是一场硬仗。

2011年至2014年的武钢股份用户服务呼叫中心项目(一、二期)，总投资1085万元，我负责项目管理、商务谈判，主持完成系统架构设计。2011年至2015年的防城港钢铁基地信息系统可行性研究及设计项目，总投资约2.99亿元，我负责三网融合整体架构优化设计，个人完成三网融合总体框架设计和通信应用软件系统设计，带领团队完成架构优化细化设计。那段日子，我和团队成员频繁往返于武汉与防城港之间，压力与疲劳、困难与争吵交替折磨着每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人退缩。

经过数轮艰苦谈判和技术论证，方案最终获得通过。2010年至2013年的武钢安防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天网工程)，总投资约4300万元；2014年至2015年的武钢股份移动办公系统；2014年至2015年的武钢地理信息系统……每一个项目背后，都是无数个不眠之夜，都是与团队成员并肩作战的深厚情谊。

2016年，我代表武钢通信参与湖北省智慧社区智慧家庭技术标准规范编制，负责智慧社区智慧家庭设施设备系统要求、业务汇聚管理平台技术功能标准的编写。同年，武汉市海绵城市智慧导览系统开发实施项目落地，30万元的投资规模不大，却让我看到信息化技术服务城市治理的广阔前景。2017年，中国一冶房地产信息管理系统项目，30万元投

资，4人团队，我再次从架构设计到项目管理全程掌舵。

这些项目不仅锤炼了我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更让我建立起一个信念：企业数智化转型不是简单的技术堆砌，而是与产业发展、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的系统工程。

建言履职，在调研中寻一条转型路

2018年1月，我的岗位调整至武钢集团总部，担任运营管理部科技与信息化总监，负责科技创新、信息化、组织绩效评价、碳达峰碳中和体系建设与管理。自宝武重组以来，我主持完成了武钢集团两项重大成果奖申报，制定了武钢集团智慧化与大数据发展规划，推进武钢集团在青山区所属产业园区的智慧化建设。

2021年，我多了一个新身份——青山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说实话，刚戴上这个“头衔”时，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沉甸甸的责任。作为深耕信息化领域多年的“老

兵”，我把目光始终盯在青山区老工业基地的转型跨越上。这些年，我一头扎进驻区企业，跑车间、开座谈、听抱怨，也听期盼，前前后后提出了有关科技创新、氢能产业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助力传统制造业升级焕新等提案。

在政协青山区十一届十五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关于以数智服务业新引擎驱动青山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建议》提案。这份提案，可以说是

我多年心血的凝结，直击痛点：建议将大力发展数智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作为核心战略，坚持“制造立区、数智强区”双轮驱动，推动传统制造与以 AI 为代表的新一代数智服务深度融合，打造“先进制造+数智服务”双引擎产业体系。同时，我也一口气提出了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布局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夯实数智服务底座、聚焦工业智能制造场景突破等几条“硬核”对策。

委员不仅要在会议桌旁建言，更要在实干中践行使命。“十四五”以来，我带领团队围绕集团管控、业务运营与园区服务，累计开展数智化项目 200 余项，总投入约 9082 万元，使公司数智化体系日趋成熟，智慧园区水平逐年提升。我大力推动企业科技创新，支撑武钢绿城、扬光公司等成功推进省级技术中心与高新企业建设。2025 年全年申报专利 26 项（含发明专利 5 项），合作项目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025 年以来，我更是铆足了劲，紧跟新技术趋势，以“AI+”赋能企业经营管理与科技创新。利用 AI 动态分析评估资产价格，提升决策科学性；利用 AI 智能体审查



在青山区政协第十一届十五次常委会议上发言

工程方案，效率提升超 10 倍，入选宝武推广清单；采用 AI 视觉算法实时监控施工现场，实现隐患即时预警；AI 驱动 RPA 机器人自动抓取填报数据，把员工从重复劳动里解放出来；协同测试财务报表 AI 分析、构建协力用工多维表、开发内控合规 AI 问答助手。我还主导开发企业级智能体平台，计划到 2026 年规模化部署不少于 50 个高价值 AI 智能体，推动 AI 从“工具调用”真正变成“数字助手”。

回头看看，推进数智化转型的征途并非一帆风顺。技术攻坚的瓶颈、跨部门协同的阻力、传统理念与新技术的碰撞，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但钢城的炉火依旧旺盛，青山的云霞灿烂。这条转型之路，我还要继续走下去。

一块板材的实业长跑

◇ 丁瑶（口述） 侯艳芳（整理）

人物名片：丁瑶，禹茜集团总裁，硚口区政协委员，民建会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母亲背着菜篮在蔡甸乡间摸黑赶路谋生，踩着武汉建材市场萌芽的风口扎根硚口；而我踏着家居行业迭代浪潮，从舵落口仓库扛板材起步，一路走到全产业链家居企业的掌舵人。深耕家居十余载，我始终笃信，板材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家梦想，脚踏实地做实业、守诚信，便是一辈子最踏实的事业。

一份匠心传家

我与建材的缘分，是伴着母亲沾着露水、满身尘土的岁月慢慢生根的。在外做生意人人尊称她“芦总”，但在我眼里，她只是一个从蔡甸乡村走出来，凭着一股子韧劲拼了一辈子的农家女子。

1962年母亲出生在蔡甸农村，跟着下放的外公外婆在乡下生活二十年。彼时全国

家居建材行业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老百姓建房、打家具全靠原木，市面没有成品板材流通，家装更是遥不可及的消费。

家境清贫，初中刚毕业，她就盘算着挣钱糊口。最早做蔬菜买卖，每天凌晨两点摸黑起身，踩着满是露水的乡间土路徒步数公里进城。冬夜寒风刺骨，双手冻得红肿开裂；盛夏烈日当头，整日站在菜摊前，收摊后腿脚浮肿难抬。靠着起早贪黑，她短短一年就成了村里少见的千元户。之后转战猪肉零售、水果批发，一分一毫攒下人生第一桶金。

1981年全家返城，十余平简陋小屋便是全家栖身之所，无资源、无人脉的母亲再次从零起步。80年代末改革开放深化，国内放开个体商贸，建材从国营专营转向市场化流通。几番摸索，她瞄准了彼时新兴的板材行业，哪怕一开始连板材品类、规格都分不清，依旧咬牙边跑市场边自学。

1991年，她挂牌成立板材经营部，成为西汉正街建材市场最早一批商户。别人到点关门休息，她留在铺面翻看报价、研判行



2003年汉西第一家建材环保超市

情；同行嫌散户订单琐碎不愿接洽，她挨个上门走访对接。硬生生从卖菜小贩逆袭为市场十大商户，而后率先入驻舵落口建材大市场，生意步步高。

诚信，是母亲恪守一辈子的经商铁律。2000年后国内家装爆发式增长，但市场乱象丛生：劣质密度板、非标杂牌板材泛滥，甲醛超标板材充斥街边小店。2006年，顶着全家反对的压力，母亲关停苦心经营多年的自有商号，全身心加盟兔宝宝环保板材。她跟我说，“卖建材是给人装房子的，人家要住一辈子，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

自此，E0级环保板材、无醛生产标准成为门店硬性红线，每一批次进货她都亲自跟进质检、核验原料。凭着实打实的品质与信义，门店接连斩获“诚信经营户”“质量信得过商户”等荣誉，大批老客户追随合作十余年，一句“跟芦姐合作，心里踏实”，便是对她数十年坚守最好的褒奖。

母亲没有读过太多书，却用半生沉浮教会我最朴素的道理：吃苦不是蛮干，是步步前行的底气；诚信不是空话，是走远走稳的根基。如今兔宝宝门店遍布武汉三镇，早年受她帮扶的下岗工人，一干就是十几年。这位平凡创业者，早已顺着行业从马路集市

到品牌专卖的变迁，把勤勉与守信活成了一生的底色。

一次薪火交接

2008年，我从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国际金融专业毕业，便进入父母创办的湖北怡居科材贸易有限公司（后改名武汉怡安居兔宝宝商贸有限公司）。入职第一天，没有办公室，没有文职岗位，父母直接把我安排在舵落口仓库做搬运工。白天扛着厚重板材穿梭库房，衣服沾满木屑粉尘，下班之后又驻守门店直面形形色色的客户。

扎根一线，我摸透板材性能、摸清市场痛点、吃透消费者真实需求，顺利完成校园向职场的转变，也亲眼见证行业新旧模式交替。2008年国内四万亿基建刺激落地，房地产高速扩容，家装行业迎来黄金增长期；但单一板材批发业态开始显露瓶颈，2010年前后，全国头部家居品牌陆续试水全屋定制，行业正式从“单品卖板材”迈入“整屋定制解决方案”新阶段。

2013年，我正式接任总经理。彼时家居行业全屋定制成为大势所趋，单一只卖板材的老旧批发零售模式渐渐失去竞争力，传统建材市场商户普遍陷入“拿货赚差价、利润逐年压缩”的困境。看准行业风向，我提出向设计、生产、销售一体化转型，没想到一纸改革方案，瞬间迎来四面八方的质疑。

老员工跟着企业打拼多年，熟悉现有的业务流程，担心全新的布局、新增的营销产品会打乱原有节奏。有人觉得转型投入大、风险高，不如守着老路子安稳经营；也有人对一体化服务的新模式缺乏信心，认为我们深耕板材零售多年，跨界做设计、加工并不占优势，纷纷劝我稳妥行事。一时间，观望、



2006年兔宝宝总部领导给丁汉友先生颁发品牌经销授权证书

不解的声音萦绕在身边，推进工作举步维艰。

不仅是团队内部，我的父母也满心疑惑。母亲一手打拼起这份实业，一辈子秉持踏实经营的理念，向来求稳。在他们看来，现有生意稳步盈利，没必要贸然做出大改动。二老担心我年轻经验不足，盲目革新会影响公司根基，既心疼我要承担巨大压力，也顾虑改革失败会辜负多年积累的心血，反复和我沟通，希望我再三斟酌。

内外阻力重重，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可我心里清楚，固守老路早晚会被市场淘汰。我沉下心逐一邀约老员工座谈，拆解行业走势、细化转型方案，带着全员学习定制设计与生产工艺；同时耐下心和父母细细分析市场变化，一点点化解长辈的顾虑。

全员思想达成统一后，我牵头搭建全新事业部，定下“放心、省心、安心”的服务宗旨，严抓原料品质，精研设计与加工工序。熬过漫长的转型阵痛期，企业迎来高速发展，销售额连续多年保持30%增幅，稳稳站稳华中中高端家居市场，也成为武汉本土较早完成“板材零售到全屋定制服务商”

升级的标杆企业，契合全国家居从单品贸易向整装服务迭代的大趋势。

一链落地红安

转型收获亮眼成绩，家人彻底放下顾虑，全力支持我后续的发展规划。

2015年起行业迎来第二次深度变革：“房住不炒”落地，地产红利放缓，单纯中间商贸易模式弊端全面爆发，上游板材工厂随意控价、供货延期，下游门店同质化内卷严重，国内头部家居企业集体开启自建工厂、全产业链布局热潮；彼时只做倒卖货品处处被动：

货源受制于上游厂家，产品品质、交货时效不受自己掌控。想要企业抗住市场波动，自建产业链、打造产业闭环是必经之路。

恰逢红安县大力招商引资，依托鄂东产业转移政策、优厚的扶持条款、完善的营商环境让我看到建厂契机。接下来整整三个月，我带队辗转各地实地踏勘，对比各地区位、交通、配套条件，反复推敲项目规划，最终敲定落地红安建设会兴全屋定制产业园。

依托企业多年积累的市场根基，我以禹茜集团为核心，着手搭建“投资+生产+贸易+服务”一体化格局，还在海南设立投资公司，用集团化模式统筹业务。2016年至今，我们在红安前后拿下200亩土地，总投资3亿元，先后建成全屋定制工业园与压贴工厂，打通板式、膜压、原木全品类生产线，整体年产能达到40万方，如今这里已是湖北颇具规模的定制家居产业园。

供应链是实业发展的骨架。过去做贸易、做零售，产业链环节分散，产品品质、供货时效都容易受外界影响，处处受制于人。我希望从根源上改变这一现状：自建生产基地，



红安县全屋定制生产工厂湖北会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外景

就能从源头把控原材料与生产工艺，把品质牢牢握在自己手中；打通设计、配送、安装、售后全服务流程，能让客户体验更连贯、更省心；同步推进数字化升级，上线云之家办公系统、布局新媒体渠道，以无纸化、智能化管理提效赋能，让传统实业焕发新活力。

一环扣一环的完整体系，既实现差异化竞争，也让企业在市场起伏中牢牢守住经营底盘，跳出传统家居市场靠门店走货的老旧格局。

一场“暖心”的股改

产业园落地、产业链成型，企业驶入稳步上行通道。在我看来，企业从来不是一人的产业，并肩打拼的员工才是企业最珍贵的财富，共享发展红利，才能凝聚长久向心力。

2018年，我下定决心推进公司股份改革，拿出期权分给骨干员工，让近四分之一的老员工都能享受到企业发展的红利，同时还推出员工无息贷款政策，帮大家解决买房、购车等现实难题。

方案刚落地，家里长辈纷纷反对。老一辈亲历白手起家的艰辛，受早年个体户独

资经营思维影响，认为辛苦打拼的收益不该拆分让利，股权下放会稀释企业收益、暗藏经营隐患，轮番劝说我终止计划，这也是武汉一众老牌建材家族企业普遍的经营思维。

我没有急于争辩，只是坚持按规划一步步推进，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每到分红节点，收益准时兑现到手，老员工切实享受到企业发展红利，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眼见实实在在的好处，

越来越多员工主动入股，把个人前途和企业的发展紧紧捆绑，公司内部形成“以厂为家、同心同行”的温暖氛围，核心骨干队伍稳定性大幅提升。

一晃十几年过去，禹茜集团已经成长为华中具备全产业链实力的家居企业，近300名伙伴携手同行，每年数千万方板材走进千家万户，累计守护十万个家庭的安居环境。回望来路，父母凭着吃苦与诚信踩中建材市场化起步的风口，我借着定制化、产业化、数字化的行业变革完成企业升级，两代人的坚守，刚好走完家居行业从粗放经销到精工智造的完整周期。

对我来说，年营收5亿元不是终点。身为政协委员，我要持续为行业发声、优化本土建材营商环境；身为企业带头人，我坚持股权共享、善待每一位并肩打拼的员工；身为传承母亲初心的实业人，公益助学、救灾帮扶也会一直坚持做下去。往后，我仍会守好一块板材的匠心，顺着家居产业绿色升级的大势，把实业做稳、把民生做实，让诚信家风，伴着一块块板材，继续奔赴万家灯火。

吴石将军在武汉抗战中的著述（上）

◇ 邓正兵 任泰宇

2025年下半年，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火爆荧屏，剧中主角吴石将军的英雄形象打动人心，也引发了观众、读者和研究者对吴石将军身世的关注和考究。其实，吴石将军与武汉渊源较深，他的军旅生涯、革命信仰与人生抉择，都与其在武汉的经历密不可分。

1912年，19岁的吴石进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两年后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这段早期的军事学习，为他日后深厚的军事素养打下了坚实基础。武汉抗战时期，吴石将军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等职，负责战略方案制定和对日情报工作，写下了大量的计划、方案、

报告、讲义及文章、著作，深受国民党最高当局倚重。由于工作性质和保密要求，这些文稿的绝大多数在当时都没有公开发表。但为了宣传抗战、普及军事知识、动员民众，他也刊发了几篇（部）论文和著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对此作一粗浅介绍，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他精炼的文笔和深厚的学识，更能体会到他浓烈的爱国之心和民族之情。

—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大部分机关



吴石青年时期

西迁武汉，党政军要人也齐集武汉，武汉成为战时首都。12月上旬，吴石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移至武昌，参与制定《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即“保卫大武汉作战计划”）。193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原来一至六部取消，另设军政、军令、军训、政治四部。军令部负责掌理全国国防及用兵事宜，下辖三个厅。第二厅厅长徐培根，副厅长吴石，但因徐培根不久调往第五战区担任参谋长，实际由吴石负责。在武汉抗战一年时间里，吴石位高权重，“劳瘁备至”（吴石回忆录语）。

1月下旬，日军分南北两路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铁路，连接南北战场，徐州会战开始。2月，日军第五师团沿胶济路西进直扑临沂。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庞炳勋第3军团驰援，依托外围阵地顽强抵抗，迟滞日军进攻。庞炳勋部苦战月余伤亡惨重，李宗仁急调张自忠第59军增援。庞、张两人早年虽有宿怨，但在民族大义面前捐弃前嫌，协同作战。3月14日起，张自忠

部强渡沂河，从侧背猛攻日军；庞炳勋部从正面反击。敌我双方在刘家湖、茶叶山等地展开惨烈拉锯战，日军多次冲锋未果，被迫撤退，中国军队取得第一阶段胜利，时称“临沂大捷”。

临沂大捷是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其侧翼阻击作用直接促成了后来台儿庄大捷的胜利。3月25日，中央社发布吴石以记者专访名义撰写的文章《临沂大捷在军事上之价值》，介绍临沂大捷的经过及其意义。次日，国民党中宣部直属《武汉日报》、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扫荡报》迅即刊发这篇文章。

吴石在《临沂大捷在军事上之价值》中开篇指出：“临沂之役，在兵力及战术上价值，并不能认为大规模之惊人战斗……但在我国长期抗战中，能获此大捷，既可挫敌气馁，更可增强我抗战力量，其对我之价值，亦殊非浅鲜也。”接着，专访介绍了中日军队为争夺临沂的兵力部署、战斗经过、双方战斗损失情况。最后，吴石谈到了他对临沂大捷的四点“感想”，其实就是临沂大捷的军事价值：

一、此次战斗，我方军乃北方军队，一般或视为非最优良之部队，反之，敌方军为主持侵略中国最积极之板垣第五师团部队，及其预备师，战斗三日之结果，竟能使敌溃败不堪。击毙及俘虏达五千人，损失在二分之一左右，由此证明我国军队之潜力，绝非一般所能推测拟议。其实，我抗战之精神与努力，全国军队万众一心，南北同强，绝无轩轻可言也。

二、自开战以来，我军在华北作战，从未有攻击敌军之后，能继之以追剿动作，即南战场上海附近作战，虽极激烈，予敌以莫大之损害，但因近于阵地战之关系，亦未实施追击。此次战斗，既击溃敌军，复施一

日行程之机动追击，于此可对敌人多方宣传予以严正之答复，且可以事实表现我抗战能力之一斑于全世界。

三、此次战斗，与其言作战计划之巧妙，则宁可归功于战斗实施之勇敢，大凡作战，纵有战略上巧妙之计划，苟各部队于战线上实施不得其当，尤以精神上不能奋勇杀敌，绝无胜利可言，战史所示，历历可考。军事家所谓作战可补战略之不足，而精神驾物质而上之。此次我庞、张二将军神勇机智，指挥有力，部队上下一意，效命杀敌，乃有此巨大之成果，此吾人不能不对庞、张两将军及其部队，表示敬意者也。

四、此次临沂之追击，与二月间在山西同蒲线方面之退却，实具同一意义。何以故？“持久作战”“消耗作战”之要义，在保持强韧性，此强韧性，若加诠释，即“时间”与“空间”之总和耳，依步步抗战，予敌以打击挫折，使其战力日见消耗，而得时间之强韧性，依广袤错综之地形，因势利导，或进而穷追，如此次临沂之追击，或退而暂避，如山西方面退出铁道线，而活跃于其东西各地，所谓“旋进旋退”之机动，使敌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即得空间强韧性，然后最后胜利操诸我手。”

吴石的四点感想，实际上是通过临沂大捷，说明了中国军队四个方面的重要议题：第一，庞炳勋、张自忠等“北方部队”，原系西北军旧部，通常被视为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但临沂大捷证明中国军队“南北同强”，国军潜力“绝非一般所能推测拟及”；第二，国军阵地战后很少有追缴敌军行动，临沂大捷则证明国军不仅能击溃敌军，而且能机动追击日军，这表明国军有极强的抗战能力；第三，临沂大捷不仅作战计划巧妙，更重要的是“战斗实施之勇敢”，庞、

张二人“神勇机智，指挥有力，部队上下一意，效命杀敌”，这是大捷的关键所在，也足以让人产生敬意；第四，战争中的“追击”与“退却”具有相同意义，都是为了“持久作战”“消耗作战”，得到时间和空间的“强韧性”“最后胜利操诸我手”。这其实是结合具体战例，阐释1938年军事委员会军训会议上“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思想。

吴石的感想和分析，涉及国军中杂牌军和中央军的关系、国军的阵地战战术、精神意志力在国军作战中的作用、抗战的战略战术等问题，由小见大，言简意赅，反响极大。《申报（香港）》《文汇报（上海）》《西京日报》《华美晨报》《半月文摘（汉口）》《华美晚报》等报刊纷纷转载，《抗战丛刊》（第三辑）、《津浦路战绩》等书籍也收入其中。

二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军虽然英勇奋战，但是败多胜少，很快半壁江山沦陷。1938年2月，蒋介石对军令部长徐永昌说：今军事失败，实由于军事教育失败。于是，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大学举办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教师多为陆军大学教师及其毕业生，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也应邀到训练团演讲。吴石曾经担任陆军大学教师，又在军事委员会任职，不仅在训练团授课，而且于8月在珞珈山主持了“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此前4月1日他在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教授的“战术”课程的讲稿《战术讲话》被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翻印，不仅成为训练团的教材之一，还在国军军官中广为流传。

《战术讲话》篇幅不足5000字，内容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

戰術講話

軍事委員會軍官訓練團印

戰術講話

其一 戰術之概念

教官吳石

甲、戰術之定義
戰術者，因應戰爭之方術也。戰爭之目的，在勝利，故此勝利之原理原則為戰術。故戰術簡言之即勝利之術也。
戰術第一應明之要諦即：戰術非科學，而為技術，蓋科學有若干之原則，苟在固一狀況之下，當得同一之效果，技術則反是，同一之原則，不必生同一之效果。德軍學城克羅維茲謂：「戰術學，與科學，實為兩事也」。哥爾志謂：「於戰爭中專上之戰術，雖具一定不變之法則，然當其適用之場合，并非如數學等科學之法則，常在固一之結果。」
戰術第二應明之要諦即：戰術含有「永久性」與「變遷性」之兩面。
永久性為千古不磨之法則，即拿破崙所謂：「戰爭法有雖然不可違反之原則」是也。此法則具體言之，如：攻勢為戰勝之惟一途徑，決勝點之戰力集注，速

吳石《战术讲话》讲义

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战术之概念”，包含“战术之意义”“在兵学上之地位”“研究战术之要谛”“战术之力”四个小节。吴石认为，战术是“因应战争之方术”“简言之即胜敌之术也”；应该明确两点：战术不是科学而是技术，战术应该包含“永久性”与“变迁性”两个方面；战术只是兵学（军事科学）的一部分，兵学包括“兵法”“军制”“技术”，广义的战术包括战争指导术、统帅术、战略、战术（狭义），和战史一起构成兵法，狭义的战术“内指挥团队之术，即实施战斗之学问也”；研究战术的要旨包括自己得来之经验、他人获得之经验、理想之经验；研究战术要形成战术之力，就是要养成三种力量和能力，即想象力、自信力、机动力。对此，吴石讲述得非常充分：

研究战术之最后结晶，不外养成三种之力，即想象力、自信力、机动力是也。

克劳塞维茨谓：“战争者，危险、劳动与困苦之集合耳；又战争实测之世界，不确实之世界，必须智力与意志。”所谓智力即想象力，意志即自信力也。

研究战术之目的，在克服战争之危险、劳动与困苦。欲克服此困难，惟有靠想象力、自信力与机动力方能之。兹更申言之如次：想象力，即孙子所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所谓知彼知己之“知”，实分两个阶段：一为明了已往及现在彼己之一切情况，一为判断将来之敌之情况，与我作某种行动时，将发生何种

效果，此两个阶段完全做到，然后方有“百战百胜”可言。拿破仑之统帅指挥，对部下军师、团队位置，无时不了如指掌；又因状况之变迁，应如何筹划因应，亦莫不成竹在胸，故彼用兵往往能出人意表，举措神妙、莫测，其实全赖于卓越之想象力耳。

自信力，即坚决之信念。德尔志云：“头脑之人，不如意志之人；自信力坚强，实统军第一要义。”大凡无主张、无担当、犹豫不定、模棱两可之人，即寻常事务，亦所不可，而况关乎国家存亡之戎事，其失败也必矣。顾自信力实根于智识学术；无智识学术之自信，乃为执拗。真正之自信，乃为强毅，执拗出于感情之任肆，强毅基于心志之修养。战术原则曾训：“决心当坚确不可动摇”，所谓坚确，在具确切之认识、充分之理由与不拔之信念。故吾人研究战术之决心，必须本此意义而养成之，不可偏于感情，先入为主之见，或蹈习陈套、作皮毛浅之论，是为要义一。

机动力，即机敏实行之力也。一般解析机动力，以为全由部队之实施，则兼指挥之

机动与部队之机动之两面。质言之，机动之根源出自指挥。孙子云：“兵贵极速未云迟之巧也。”所谓速，非仅赖于部队至机敏之行动而已，必须任统帅指挥者能临机速断、敏捷实施。故为指挥者，既经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即当立时以最敏捷之手段付诸实施，不容丝毫之迟疑逡巡。至部队之机动，亦为战胜最紧要条件之一，亦即所谓战术之力最紧要部分。此种机动，有赖于平时训练者居多，“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在昔已然，矧兵器之外、战士之众、战况之繁、战事之惨，如今日者乎。惟训练精到之军队，方能众志成城、奋勇活跃，于枪林弹雨之间，其活动不特与卓越之统帅相须以达作战之目的，有时且足补统帅指挥之不及。

《战术讲话》第二部分为“作战一般之要领”，包含“作战之肇始”“集中”“会战”三个小节。吴石明确指出：

国军一旦与敌开战，当依照平时所定之作战计划而行动，并命定战斗序列，规定作战军之编组；而基于作战之目的，对各方面军或各军，付与作战之任务。集团军司令官或军长于作战开始之初，基于所受之任务，并当时所得各种情报，而策定作战计划，资为作战之指导，同时对各机关之业务，予以必要之准绳。

为此，吴石讲述了国军如何集中、如何开展会战、如何机动、如何战斗、如何追击等战术，对集团军、军、师及其长官的任务和战斗行动的开展均做了详细的讲述。如关于“战斗”部分：

当战斗之际，集团军司令或军长应自始至终，自任其主宰，付与部下兵团以必要之任务，互相协力，以遂行战斗。

骑兵大部队，先则基于任务，实施搜索，并掩护作战军之行动，迨各兵团与敌冲突，

开始战斗时，则任敌侧背之威胁，我侧背之掩护，或补填两兵团之间隙，应乎机宜，参加战斗。

军当战斗开始，则以航空队之一部或大部，配属于第一线兵团，或但使其协力第一线兵团，其余则使担任搜索，指挥，联络，或制空权之获得，应乎必要，并令参加地上之战斗。

各师既受攻击敌军之任务，及其接近敌时，即当紧缩其纵长，以期适时可以开始战斗，此时期对于搜索，常更周密，依状况之进展，则令各部队就开进之配置，次则展开，或不行开进而逐行展开。

师长，当战斗指导方针既定时，即基之以下达命令于各部队，使各兵种协同，发挥其战斗能力。

如是藉指挥官之適切战斗指导，与各部队之奋励与协同，乃克压倒歼灭敌人，而获得胜利。

吴石《战术讲话》内容丰富精深，上承中国传统兵学《孙子兵法》精髓，外吸西方克劳塞维茨、拿破仑等军事家思想，既有理论上的探讨，更重实际的操作。无怪乎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特别刊印，并深受参训学员欢迎。

邓正兵，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授；
任泰宇，江汉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倪季端：鲜为人知的武汉中学创办人

◇ 戴剑华

1920年春天，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创立，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人才的摇篮，走出了董必武、陈潭秋等三位中共一大代表，培养了众多革命骨干，誉为党史上的“最牛中学”。来自湖北黄安（今红安）的倪季端，正是这所传奇学校最初的九位创办人之一，为其创立与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



倪季端（字测天），出生于黄安倪赵家村一个书香门第。其父倪照发为人正直，重视教育。经几代积累，倪家在县城购置三处店铺，并在东门上岗经营米行，与县城南正街董基浚（董必武大伯）的“酱园董家”交

好。倪照发育有三男三女，倪季端排行第三。长兄倪昴端为清末秀才，曾任黄安高等小学校长。次兄倪秀端任黄安商会副会长，乐善好施，常救济贫苦农民，并向革命组织捐助钱物。倪季端自幼聪颖好学，在黄安高等小学就读期间受教于董必武，师生情谊深厚。后考入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并进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深造，为其投身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武昌求学，结识陈潭秋投身爱国洪流

1916年夏，倪季端考入武昌高师。在此，他不仅得聆国学大师黄侃等名师教诲，广泛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开阔眼界，更结识了钱亦石、张栗原、陈潭秋等一批优秀学子。尤其与英语部同班同学陈潭秋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形影不离。彼时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高涨，倪季端与陈潭秋日益关注国家命运，积极投身社会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武昌高师学生率先



1916年秋，武昌高师英语部一年级合影，前排右三为倪季端，后排右三为陈潭秋

响应。在陈潭秋带领下，倪季端与英语部全体同学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洪流：联络学生罢课，三次参加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的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运动。1919年6月1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残酷镇压游行学生，逮捕数十人，殴打武昌高师学生陈开泰、吴序宾等十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武汉学联于6月4日通电全国揭露军阀暴行，同时决定派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上海之行，介绍董必武与陈潭秋历史性会面

1919年6月，武汉学联选派4名代表赴沪参会。适逢武昌高师规定英语部学生毕业前须赴外地考察，倪季端、陈潭秋及全体毕业生遂选择与学联代表同行，前往南京、上海考察。学联代表返汉后，倪季端与陈潭秋决定留沪深入考察。此前2月，湖北旅沪善后公会

已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成立。为节省开支，倪季端提议前往探访，得到陈潭秋赞同。二人来到善后公会，主持会务的董必武、张国恩均为倪季端同乡，热情接待了他们。此乃陈潭秋与董必武的初次会面。

倪季端最突出的历史贡献之一，正是作为介绍人促成了董必武与陈潭秋的相识，不仅开启了他们长达20多年的并肩奋斗，也成为陈潭秋

革命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董必武在回忆中动情说道：“我第一次见到陈潭秋是1919年夏天。那年，我刚从日本回国的李汉俊都在上海，住在渔阳里，经常在一起谈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陈潭秋，经他同班同学倪季端的介绍，我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

在上海期间，董必武与陈潭秋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并商定回湖北后以办报、办学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湖北旅沪善后公会旧址

筚路蓝缕，协助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

1919年8月，董必武返汉，与张国恩同住武昌巡道岭湖北省教育会内。原计划筹办《汉口新报》，但因集资困难（原定出资者退出）而搁浅，遂转而决定创办中学。

然而白手起家办校，在当时谈何容易。最终，一个以“教育救国”为宗旨的9人创办团队形成，包括董必武、张国恩、刘鼎三、李緘三、刘质如、倪季端、江文波、雷大同、刘觉民。他们每人捐资20元（雷大同捐120元），共同承担开办费用，使这所私立中学实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倪季端作为创办核心之一，不仅出资，还深度参与了校址选定、教员联络和校务运作。

关于这段经历，董必武曾回忆道：“我回到武汉就办武汉中学，倪季端、陈潭秋正巧刚毕业没有派事。我先与倪季端谈，他同意。他又把陈潭秋约来，陈教英语，我见他很负责，和学生关系又好，与他关系很好，后来他当了班主任。”他还提到：“我和张国恩、倪测天（倪季端字测天，他与陈潭秋是同班同学）三人，还有江文波。雷大同与在中华大学教书的刘觉民关系好，政治色彩不浓，刘愿意办学，愿与外边交涉，还可以出点钱。还有郭肇明，他当过第一师范校长，我们请他当董事长，他与张国恩关系好，郭与官厅关系好，每人出二十元。刘觉民愿意当校长，住在学校，江文波当监学，郭肇明在武汉有声望，当董事长……”

董必武因手中无积蓄，便将身穿的一件皮袍典当，又写信向在山西做事的表弟张醉



私立武汉中学旧址

华借钱，共凑得20元捐赠。立案基金则由董必武、张国恩找到在汉口大蔡家巷开设太正山货行的黄安同乡张平楷，由其出具存款2万元的凭证，报湖北省教育厅备案。校址选定涵三宫街南面小巷内的省教育厅西北角一处原师范甲丙堂旧址，整修了遗留的黑板、课桌、家具。如此，有了校舍和基本资金，再通过招考收取报名费补充。

经众人努力，1920年3月，武汉中学正式开学。董必武主要负责外部事务，校内管理如招聘教师、招收学生、课程安排等，则全权交由倪季端负责，他成为董必武办学的得力助手。

倪季端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和教学。据知情者回忆，他性格直率，治学严谨，深入了解学生学习和生活状况，循循善诱，平易近人；教学注重启发引导，调动学生积极性，课堂气氛活跃；讲解细致耐心，使学生学有所获，深受学生敬佩。

倪季端不仅是组织者，也是教育实践者，与陈潭秋、陈荫林等人一同担任英文教员，将语言教学与思想启蒙相结合，影响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这种“教员+革命者”的双重身份，使武汉中学成为五四

运动后武汉地区思想觉醒的重要策源地。

武汉中学在招生和教学上敢于革新：提倡白话文教学，国文课以白话文为主；虽教育部章程禁止男女同校，仍招收了几名女生与男生同班授课，堪称大胆之举。

学校教师多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和武昌高师等校，思想进步，教学认真。初期教员皆为义务授课，后期仅领取微薄薪金。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赢得了家长和学生的信赖，报考者众多。建校仅4年，在武昌高师当年在两湖地区招收的约百名学生中，武汉中学第一期毕业生就有4人考取。

董必武十分关心倪季端的个人生活，介绍他与同在武汉中学教英语的上海姑娘余道德结为伉俪，并为其新婚题写对联（因年代久远，只记得上联以“季”字开头、“端”字结尾，下联以“道”字开头、“德”字结尾，横批为“季道好合”）。婚后二人育有一子倪正纯。倪季端逝世后，余道德携9岁的儿子返回上海居住，后与老家失去联系。

风雨如磐，白色恐怖下播撒革命火种

1928年，桂系军阀占据武汉，武汉中学因宣传革命思想遭查封停办，倪季端被迫离校，辗转各地任教，曾任武昌第四小学校长，1930年调任武昌第九小学校长。

在汉读书和任教期间，深受董必武、陈潭秋等进步思想影响，倪季端思想活跃，每次回乡都向青年宣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投身革命。在白色恐怖时期，他利用教师身份作掩护，为共产党人及其家属提供掩护，并为他们争取工作和学习机会，成为黄安地区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其革命言行招致国民党反动派仇恨，其家乡住宅亦因此被烧毁。

倪季端虽未直接参加武装革命，但通



2024年清明节，作者与倪季端侄孙倪明森在董必武纪念馆留影

过办学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众多人才。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根据其父母与倪季端的交往，推测他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

正如倪季端的朋友、原湖北省政协常委、五四运动亲历者郑南宣老人所言：“他对培养革命力量，是出了力的，是有贡献的，至少是同情革命。”

1935年，倪季端在武昌病逝，安葬于小东门外姚家岭，结束了他为教育事业奉献的一生。

倪季端先生的名字虽鲜为人知，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和革命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人物。他不仅是武汉中学关键的创办者与校务支柱，是连接董必武、陈潭秋等革命先驱的重要纽带，也是在教学一线播撒火种的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事业默默奉献了智慧与力量，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戴剑华，文博研究馆员，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曾任红安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管理处副主任

中共中央在武汉三设长江局

◇ 刘 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伟大历程中，武汉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革命重镇。1927、1930、1937年，中共中央三次在此设立长江局，不仅印证了武汉作为长江流域革命枢纽的核心地位，也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一个缩影。

1927年和1937年设立的长江局广为人知，而1930年设立的长江局却鲜少披露。本文重返历史现场，通过梳理三次长江局的历史脉络，并透过红色建筑遗存，探寻革命奋进历程与城市空间印记之间的深度联结。

第一次长江局（1927.9—1927.11） 白色恐怖下的临危救局与组织重建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

派实行白色恐怖。数月间，中共党员从近6万锐减至1万余人，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中央机关迁往上海。

为代行中央职权，统一领导长江流域各省恢复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于9月下旬在武汉设立派出机构——长江局，以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组成长江局常委会。毛泽东正领导秋收起义余部转战，未到武汉实际履职。10月1日，《中央关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明确长江局的总任务——以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争取两湖政权，带动多省农民运动，并在武汉以经济斗争发展秘密工会，通过巡视改造各级党部、加强刊物宣传。次日，长江局第一次会



1927年长江局书记罗亦农

议议决：罗亦农为长江局书记兼湘、鄂、赣、豫、川、皖、陕、甘8省军事特派员。

为落实上述方针和决议，长江局在复杂局势中主要开展了四项重要工作。第一，健全和调整所辖各省党组织。10月17日指示江西省委调整领导班子，指定陈潭秋为书记；10月22日至24日，罗亦农、王一飞按照中央指示改组湖南省委，由王一飞任书记；审批各省暴动区域方案及党组织建立计划，决定建立直接指挥的湘鄂赣交界特别区。第二，抵制“左”倾盲动主义。反对河南省委立即举行全省暴动的计划，支持豫南特委“从小的暴动开始，进行到大的斗争”的稳步方针，抵制中央关于发动湖南全省暴动的主张，制止湖北省委决定举行的武汉暴动。第三，开展游击战争，着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受挫后，长江局提出不能即刻举行大规模总暴动。在其主持制定的《湖北省委工作计划决议案》《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及给各省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在总暴动条件成熟前，应注重领导农民的经济斗争，主要形式为游击战争，并在

条件允许的地方实行割据，建立根据地。随后，豫南的确山、赣西南的吉安及湖北的黄安、麻城等地均发动农民武装起义。第四，根据决议案中发展职工运动的要求，规定了所属各省城市工人运动的方针，即重点发展经济斗争、建立秘密工会组织，并反对国民党成立的改组委员会。

1927年11月11日，因白色恐怖持续加剧，长江局作为秘密机关难以有效统筹八省革命工作，加之中共中央为适应分散斗争的形势调整地方领导体系，长江局被正式撤销。之后，罗亦农相继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湖北省委书记等职，继续在武汉等地领导革命斗争，1928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4月21日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26岁。

长江局是大革命遭遇重大挫折、中国革命陷入低潮的严峻关头，中共中央在长江流



1927年长江局旧址

域设立的首个统一领导机构，临危受命于白色恐怖的高压之下，全力恢复长江流域遭受严重破坏的各级党组织，指导推动了黄麻起义等武装暴动，为鄂豫皖、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为党积累了隐蔽和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成为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重要步骤。

作为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武汉既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摇篮，拥有深厚的革命基础，又凭借汉口俄租界的特殊环境，能为秘密革命机关提供相对隐蔽的运作空间，成为设立长江局的最优选择。

长江局旧址位于原汉口俄租界珞珈碑路12号，今珞珈山街12号。该建筑建成于1910至1920年代，由德籍石格司建筑事务所设计、汉协盛营造厂施工。现为武汉市文保单位，湖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筑为砖混结构，清水红砖墙搭配拱券木窗，立面简洁明快，形制稳固实用。独栋式布局配属独立庭院，空间私密性强，适配白色恐怖环境下秘密机关的运作需求。这栋带有近代租界殖民印记的外侨住宅，因党的隐蔽革命斗争被赋予全新历史内涵，转化为承载厚重党史记忆的红色革命遗址。目前，相关部门正依托该旧址筹备展览，推动其成为党史学习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第二次长江局（1930.8-1930.12） 激进浪潮下的暴动统筹与军事攻坚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共产国际基于“第三时期”理论，判定世界革命高潮已然来临，推动各国共产党采取全面进攻路线。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1930年长江局书记项英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不久，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短期胜利，进一步刺激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全面推行。李立三等人随即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为实现该计划，中共中央长江局于7月下旬正式成立，由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组成常委会，项英任书记。8月7日，项英在武汉主持召开长江局会议，决定将长江局与湖北省委合并，党团组织统一起来，成立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统筹鄂、湘、赣、豫、川五省初期的党务、军事及工农运动。9月下旬，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项英调往中央苏区工作，关向应接任长江局书记。

长江局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以在武汉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为核心目标，整合党、团及工农组织力量，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全力筹备城市武装起义。



1930年长江局书记关向应

为组织武汉暴动，长江局调整武汉三镇及周边党组织，新设区委、分行委并全部纳入行动委员会体系。1930年8月29日，中央指示暂时撤销湖北省委，9月初成立武汉市委，长江局随即向其移交武汉基层党组织领导权。二是统筹调度鄂、湘、赣、豫等省红军主力，集中兵力进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落实“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三是发动长江流域农民暴动，在武汉周边及各省中心城市近郊开辟游击区域，为城市起义构建外围策应屏障。四是深入国民党驻军开展兵运工作，瓦解敌军力量。因脱离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上述计划最终在实践中受挫。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正式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会后，长江局停止武汉暴动等冒险任务，撤销各级行动委员会，全面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体系与日常工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苏区政权建设、红军发展巩固和白区群众工作整顿上来。12月，由于叛徒出卖，长江局多处核心秘密机关遭国

民党当局破坏，数十名革命同志被捕牺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撤销长江局，撤离大部分工作人员。

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后，项英即受中央委派赴中央苏区筹建苏区中央局，后历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等职，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关向应在项英离汉后接任长江局书记，主持长江局末期工作，后历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八路军第120师政治委员等职，1946年在延安病逝。长江局前期因贯彻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给长江流域革命力量造成了严重损失，其存续与纠错的过程，深刻折射出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与曲折。

武汉工农运动基础深厚、跨区域联络优势显著，故在此设立长江局。因白色恐怖严峻，长江局未设集中、固定的办公场所，核心秘密机关选址汉口英租界湖南街5号，接头、招待、印刷、交通等配套机关分散于法租界及中山路新成里、张美之巷等周边区域。这里商贸繁盛、里巷交错，兼具隐蔽性与流动性，适配统筹五省暴动、分散规避搜捕的工作需求。1930年12月，这些分散的机关相继遭到破坏。历经近百年城市变迁，当年的建筑本体已无处寻觅，而这种依托英租界特殊环境的分散布局方式，成为第二次长江局独有的建筑印记。

第三次长江局（1937.12-1938.10） 全面抗战中的统战引领与组织再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全民族抗战序幕拉开。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随着上海沦陷、南京告急，

武汉凭借其地理优势，逐步成为全国抗战中心。历经十年土地革命，中共已能清醒研判时局、制定战略，实现从武装对抗到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

为整合十年内战中分散受损的南方党组织与革命力量，用好国统区公开合法的活动空间，中共中央亟需在武汉设立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工作的专门机构，强化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统筹八路军、新四军在南方的行动，与国民党开展协作，争取国际援助。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武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分别统筹南方各省党的工作、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络谈判。12月23日，上述两个机构正式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经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调整，委员为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凯丰、叶剑英、董必武，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

长江局成立之初，设参谋处、秘书处、民运部、组织部、党报委员会5个机构，后增设宣传部及职工、青年、妇女、国际宣传等专项工作委员会。机关设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内，工作范围涵盖滇、黔、川、鄂、湘、豫、赣、皖、苏、浙、闽、粤、桂等十余省，直接领导或指导上述地区党组织及东南分局、新四军的工作。

与前两次长江局不同，第三次长江局处于国共合作的历史时期，能够公开开展工作。其核心工作如下：一是参与国共两党高层谈判，推动两党军事政治协同，广泛团结民主党派、爱国工商界与社会名流。二是全面恢复重建南方党组织，完成长江流域及华南13个省的党组织重建工作，夯实党在南方的组织基础。三是引领国统区抗日舆论与



1937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群众动员，创办《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党报党刊，领导武汉七七献金、抗敌演剧宣传等活动，掀起国统区抗日救亡热潮。四是统筹南方军事工作，完成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协调八路军、新四军在南方的军事行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与敌后游击战争。五是拓展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接待斯诺、白求恩等国际友人，对接国际援华组织，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共抗战主张，争取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支持。

1938年9月，武汉会战日趋激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长江局分设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并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系统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强化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正式决定撤销长江局。10月25日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率相关人员撤离武汉，长江局工作基本结束。长江局撤销后，王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

长江局在抗战初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南方党组织、推动新四军组建与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受王明影响，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忽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给南方革命力量发展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长江局旧址位于原汉口日租界中街 89 号（今长春街 57 号）的大石洋行，作为逆产没收，环境安全，空间充足，适配办公需求。该建筑 1944 年遭美军轰炸损毁，1978 年按原貌复建，1979 年对外开放，现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筑风格中西结合，主体为四层日式砖混结构楼房，内部设有中国传统庭院，缀以假山花木，整体简洁庄重。一层原为商行，后作为副官室、接待室，二至四层原为高级公寓，复原陈列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办公室兼卧室，以及电台室、机要科、会议室等。这种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空间布局，是抗战初期党在国统区坚持抗战、灵活斗争的生动缩影。

中共中央在武汉三次设立长江局，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经血火考验、逐步走向成熟的见证。第一次长江局是大革命失败后党跨区域领导武装斗争、抵制“左”倾盲动的探索，却未能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桎梏；第二次长江局是党统筹南方革命力量的尝试，虽因“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但积累了经验教训；第三次长江局是党在全民族抗战中探索统一战线规律、凝聚抗日力量的重要实践。三者共同构成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历程，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



长江局机要科复原场景

昔日，革命先辈于汉口租界建筑中开辟革命阵地；如今，这些镌刻着共产党人勇毅求索足迹的老建筑，正深度融入汉口历史风貌区建设，完成从殖民遗存到精神地标的价值涅槃，实现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的跨越。

注：本文为武汉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武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课题编号：WHHS20242015）成果。

刘艾，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向大戏靠拢：从花鼓戏到楚剧

◇ 梁 方

“戏曲与生俱来地形成了一种以‘程式化’为核心的艺术形态谱系，并且一直生存于一种谱系化的网络之中。”这里的所谓“谱系”，本质上，既是一种定型化的文化形式规则的体现，也是形之于外的一整套的符号体系，包括唱腔有“板眼”，伴奏有“经”，角色有“行当”，身段有“谱”，动作有“功法”，行止有“分寸”，造型有“工架”，穿戴有“规则”等。因此，这就决定了要想在“谱系化的网络之中”生存，“人简、服装简、乐器简”的楚剧，必须向京剧、汉剧等大戏靠拢。按楚剧艺人自己的话说，“那时的花鼓戏，处处向大戏学，争取社会上承认花鼓戏是一个正式剧种”。

改弦更张加伴奏

传统戏曲的表演首先体现在曲谱的运用。何为曲谱？完整曲谱的出现，体现了这一剧种形式的成熟以至形成某种范式，是其艺术构成的分工趋于细密和定型的结果。

据1948年11月1日《大刚报》之《漫话楚剧之沿革》记载，“楚剧在名为花鼓戏的时节，并没有胡琴，却只有锣鼓，那时的唱法是‘帮腔’——‘哦呵腔’，就是打锣鼓的人及台上幕后的一伙子人，都做‘接尾子’的工作，如《蔡鸣凤辞店》中蔡鸣凤所唱：‘蔡鸣凤，站大街，思前想后。思家乡，想骨肉，泪双流。’句中之‘后’字及‘流’字，均为帮腔，由一大伙子人同唱。花鼓戏更名为楚剧，由露天走进剧场，由草台转上了舞台，于是也就废除了‘帮腔’的唱法，请上几个上街的算命瞎子先生，坐在台上拉起胡琴来代替帮腔了。”

虽然“当时‘哦呵腔’很流行，武汉的‘打铜帮’‘猪鬃帮’，以及做小生意的，泥木工等手工业作坊，晚上干活时都爱唱‘哦呵腔’。一唱就是整出的戏，一唱众和，非常热闹”，但是文人的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向我们提意见，说你们这个戏好是好，就是不沾弦，没有丝弦就不是戏了”，以及官方的管制，“认为唱接腔，就是花鼓戏，证据

确凿、铁证如山，就要被禁演”，于是“我们提到要进行改革。要改革，只有向汉剧学习，加胡琴伴奏，去掉帮腔”“当时不惜重金，请汉剧的琴师。”

据陶古鹏口述：“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间改加胡琴，于是就请来严少臣先生（汉剧）给我们设计音乐，由我开始采用胡琴伴奏上台演唱，第一次用胡琴演的是《白扇记》”“我在天仙茶园，采用胡琴伴奏的效果良好，后来其他各家花鼓戏茶园也都仿效我们，加上了胡琴伴奏。”在加上胡琴伴奏的同时，逐渐添增了月琴、唢呐等乐器。1931—1934年，楚剧大为改观，最终形成了京胡、京二胡、三弦、月琴四大件。

生旦净丑齐行当

戏曲之有角色行当的划分，既是观演之间一种约定俗成的审美惯性，又是衡量一个剧种艺术造诣高低的关键性标识。“生旦净丑”四大基本行当，是以丰富的剧目作为其表演艺术的重要支撑。

据《漫话楚剧之沿革》记载，“在未更名为楚剧之前，此剧多流行于各地乡间，



小旦



小生

而湖北黄陂为其发祥地，那时的花鼓戏均演出在露天剧场的草台上，角色也无老生、老旦、花脸这些玩意，仅仅只有所谓花旦和小生，因为那时花鼓戏所演的大多是青年男女的私情事件，如《蔡鸣凤辞店》《玉莲汲水》《站花墙》《董永分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但也有花旦和小丑合演的如《卖棉纱》《海罗灯》《张先生讨学钱》等”“后来楚剧更来了一次改良，他的小生的说白和唱词都改为汉腔，老生则是汉剧化，还有所谓的武小生，则全是京剧的派头。”

小旦、小丑、小生，乃楚剧的主要行当，由玩灯时“折子戏”中的一旦、一丑发展而来。随着反映爱情故事的“折子戏”增多，生行便逐渐突出，形成“三小”。至清末民初，黄孝花鼓戏渐入汉口老租界的茶园，班社不断扩大，演员的新陈代谢引起行当的更替，已能演六出戏，分别为“胡子戏”“小生戏”“老生戏”“花旦戏”“小生花旦或老生青衣戏”“丑角戏”。到“本地街”（华界）后，逐渐只演五出了，没有了“胡子戏”。加之受京、汉剧行当艺术的影响，楚剧演员在表现行当的个性特点及声音形象上有所追求，导致进一步的角色分工。当才艺并优的小

生、花旦聘入后，年事较高者便专工老生与青衣。花脸不再由小生兼演，而由嗓音宏亮的老生代之，老旦则由青衣所代。到20年代末，楚剧生、旦、净、丑各行当已初具规模。30年代中期，连台本戏风行武汉，楚剧艺人所扮角色已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侠客义士、神怪鬼狐等无所不包。至40年代，很多剧目中都有较大的武打场面，武旦、武生、武净、武丑已成专行。

粉墨登场建谱系

围绕着行当，戏曲服饰自有一套谱系，它是人物形象造型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有着强烈的表现性和装饰效果。戏箱的规模，一般受制于戏班经济力量而繁简，使用上还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则，成为戏曲表演的基本的穿戴规制。

黄孝花鼓戏时期，艺人都是男性，人物扮饰极简，常借助简单的面部化妆及服装、扇子、手帕之类来区别角色的性别，其扮饰仅包头、假髻、道袍、嫁衣、兰竹布衫裤而已，而行头只有云帚、马鞭、云巾、儒巾、髯口、水衣等。

20年代末期，各种戏班在汉口轮换演出，竞争激烈，楚剧由租界走上“本地街”，不但以富有生活气息的故事情节与京、汉剧争胜，而且把提高和丰富舞台美术作为争取观众的一个重要手段，极力学习和模仿京、汉剧等大剧种的装扮规制，人物造型逐渐行当化。30年代初，一部分楚剧戏班演唱本子戏，开始大量使用行头。起初是租用京剧衣箱及管理人员跟箱，后来许多主要演员则自置行头入股提账，行头的购置及管理主要以京、汉剧为摹本，因角色而分蟒、靠、帔、官衣、褶子等五大类。楚剧衣箱主要分大衣



沈云陔饰《夜梦冠带》崔氏剧照

箱、小衣箱、盔帽箱，大衣箱主要管外角行头，小衣箱主要管理内角行头，盔帽箱管盔帽、髯口、靴鞋等。衣箱的规模由于各戏班的经济条件不同而有差异，最著名的楚剧衣箱是沈云陔、李百川、徐俗文、高月楼的“四喜堂”衣箱。

四功五法渐完善

楚剧在“花鼓”时期，表演简单朴实，凡是生、旦为主的“正剧”或“悲剧”，以唱为主，一唱到底，舞台调度仅只有几次“过场”。丑角戏多为表演生活中的笑料，白多唱少，动和舞亦为“灯会”时的民间歌舞形式。1902年进入汉口租界后，演出剧目不断增多，原有的表演手段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楚剧老艺人自嘲：“要演出袍带戏，就要穿蟒披靠、骑马坐轿。要表现战场厮杀，就要舞刀弄枪、会阵开打。可是当时楚剧艺人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甚至连宝剑也不知该挂哪一边，马怎么样上，枪怎么拿。于是努力向‘大戏’学习、借鉴。”

1930年代，上海京剧名伶周信芳、林



袁壁玉饰《薛仁贵》薛仁贵剧照

树森、小杨月楼、白玉昆等相继来汉演出，尤以周信芳的“麒派”艺术让程式服从于人物，满春戏园领班沈云陔在借鉴中取其精髓，表演已达相当深度，楚剧的《左维明巧断绣鞋案》就是一例。此剧原为李百川编写的连台本戏《天雨花》中之一出，京剧演员白玉昆曾在沪跟周信芳配演左申，到汉后演左维明，表演中的唱、念、做等戏曲程式的安排以及情感节奏，都给了楚剧演员很大的启示。

当时白玉昆在“京剧大舞台”演出，沈云陔、李百川、高月楼常去观摩，也就是“偷戏”。看后回来就模仿，虽然略显生硬，如“对鞋”一节带身段的表演，唱的是京剧曲牌“进鸾房”，但整体上讲，比以前以“唱为主”和简单的舞台调度来说，手段就丰富得多，圆场、跪步、蹉步、吊毛、抢背等基本功，“偷”回的“玩艺”竟用得恰如其分。此后，又经上海京剧名旦刘小衡特别指点，专为沈云陔重排《左维明巧断绣鞋案》一戏，并着重加工“对鞋”一折的身段与节奏，亲自操琴与沈论身段，沈受益匪浅，表演更进一层。后沈云陔等艺人又将京汉剧“唱、做、念、

打”的手段、技巧与楚剧“三小”的表演特点熔于一炉，逐步形成自己的表演程式，同时，还借鉴国术中真刀、铁枪、拳棒的武打，使观众大为震惊。

一剧之本文化化

戏曲艺术的形态谱系，还表现为剧目编演的一些惯例、套路，形成鲜明的剧目谱式，恰如有论者指出的：“中国传统戏曲题材内容与情节编撰，曾存在相当普遍的雷同、因袭和类型化现象。例如，恋爱剧，多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婚变剧，多是‘书生负心附高门，怨女阴间来索魂’；宫廷剧，多是‘白脸奸臣害忠良，抄斩遗孤大报仇’；神话剧，则是‘上天飞降思凡女，贫贱夫妻乐相守’；侠义剧，则‘见色强霸花公子，拔刀相助拜义兄’；公案剧，则‘贪财害命陷无辜，公堂铁面断是非’；功名剧，则‘高堂逼考别荆妻，一门旌表大团圆’；家庭剧，则‘嫌贫爱富兄与嫂，苦读书生衣锦归’……不一而足。”并且，这种戏曲剧目编撰的谱式带来了一种明显的创作与欣



沈云陔饰《断桥》白素贞剧照

赏的惯性，比如，题材上的重复与提炼、情节结构的平铺直叙、社会感化功能的强调、借古喻今的机智诙谐等等。

黄孝花鼓进汉口城的最初20年，剧目变化不大，主要上演“二小戏”“三小戏”，极尽简单。1925年出现了武戏，并逐步由演折子戏发展到演有头有尾、故事完整、情节复杂的本戏。30年代，楚剧受“海派戏”的商业化影响，连台本戏几乎占全部演出场次80%左右，题材多是神话、武侠、公案剧，如《水泊梁山》《薛刚反唐》《七侠五义》《施公案》《济公传》《西游记》《封神榜》等。这些连台本戏，多为提纲戏，没有台词，称之为“活本子”，少数重点场有台词和联弹唱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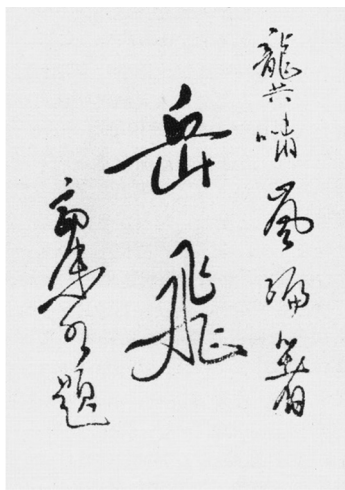
《梁祝》剧照

及连台本戏《岳飞》《清宫十三朝》，是楚剧剧本文学化，剧本结构日趋成熟的标志，尤其是《岳飞》被官方媒体称赞为“旧剧改革”的“最宝贵的实验”。故而，1946年11月11日《罗宾汉报》之《楚汉剧兴衰今昔感》，作者将“楚剧同人头脑清醒，鉴于时代进展，本身力弱，乃不惜厚礼重聘，物色剧本，尊重文化人剧作家，虚心求教”，视为“楚剧之兴”的优点之一。时人之评价，可谓公允。

20世纪20年代始定名的“楚剧”是在黄（陂）孝（感）花鼓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地方戏曲。民国初中期，因缘际会，花鼓小戏由民间的乡野草台进入大汉口的都市剧场，完成了“楚剧”地方剧种的身份定型，其“身份”的主体建构、认同，与其艺人“向大戏靠拢”的文化自觉和艺术革新密不可分。

（本文图片来源：《楚腔楚韵五十年》
《楚剧图文志》）

梁方，历史学博士，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郭沫若为楚剧《岳飞》题写的剧名

1934年楚剧大受剧本荒的影响，老戏被禁演几十出，于是聘请了“常为朱双云写京戏”的龚啸岚。这位被楚剧艺人王若愚称为“伏龙”先生的职业剧作家，被戏剧界认为是楚剧剧目发展史上的转折点。龚啸岚编演的剧目，如《潇湘夜雨》《杀狗惊妻》以

武汉航空轨迹追寻（九）

◇ 刘宝森

日军在武汉修建六座军用机场

日军侵占武汉后，飞机从汉口起飞，逆江而上很容易找到重庆，以对重庆实施大轰炸。因此，日军占据武汉期间，在原有机场的基础上，大肆兴建新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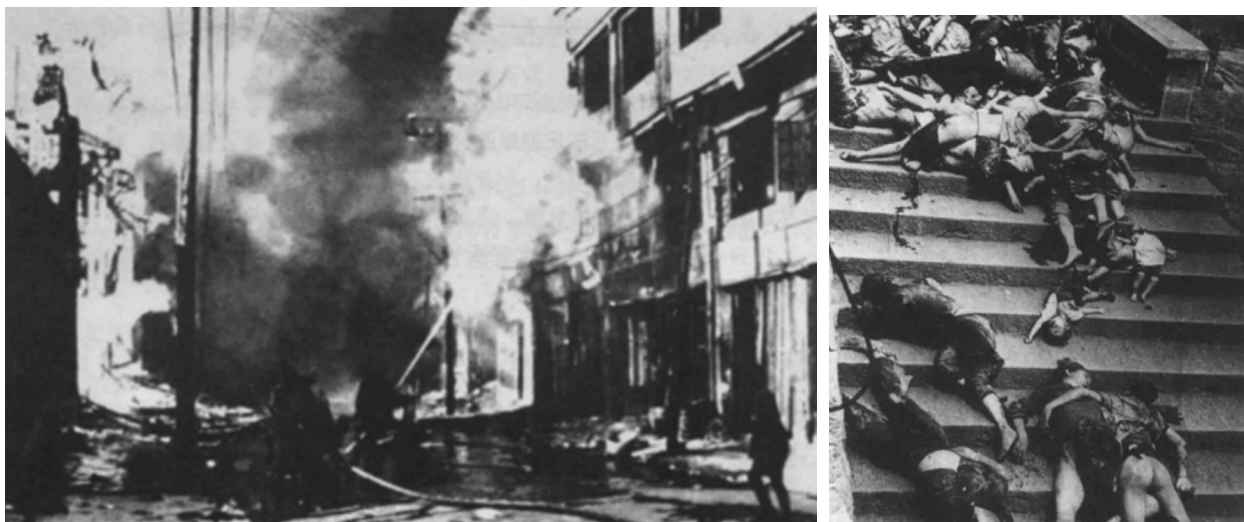
1938年12月，日本海军航空兵将毗邻王家墩机场的华商跑马场改建为大型机场，铺设两条跑道，设立为W飞行基地。观众台改建成司令部和兵营。附设飞机厂、弹药库、送信所等，供给、支援设施较完备。可容纳日本海军第一、第二联合飞行队和陆军航空兵飞行团，共辖200多架飞机。

W基地多次受命对重庆实施大轰炸。

1939年5月3日，由第13、14航空队所属的45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组成空袭部队，对基本未设防的重庆市中心区域狂轰滥炸，共投弹166枚，其中爆炸弹98枚，燃烧弹



汉口日军飞行W基地略图（1939年）



日军重庆大轰炸及遇难民众

68枚，时间长达1小时50分钟。次日，日机将狂炸目标锁定在重庆上半城的商业中心，共投弹126枚，其中爆炸弹78枚，燃烧弹48枚。

1944年12月18日，美军第20航空队B-29轰炸机轰炸日军沿长江两岸密布的军用仓库、码头及汉口日租界，并对W基地实施地毯式密集轰炸，使之彻底毁灭。

1938年，日军占领黄陂县城，随后在黄陂滠口修建飞机场，役使民夫5万余人。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政府空军总司令部的《全国机场存废案》，湖北保留16处机场，废除滠口等11处机场。

1941年，日军强占民地修建武昌徐家棚机场，1943年8月建成。跑道一条，宽24米，长488米。滑行道一条，一端与跑道相连，长2000多米。道面皆为水泥混凝土，厚不足10厘米，下垫碎石道基。机场供驱逐机、战斗机使用，是临时赶修的军用机场，设备欠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空军接收徐家棚机场。由于机场地势较低，一遇大雨积水浸灌，以至道面剥蚀甚多，飞机起降危险。

1946年夏，由中航、央航两公司租用，但起降飞机均为C-46及C-47型，载重较大，原有跑道、滑行道厚度实难负荷，跑道长度亦感不足，道面损坏严重，加之一向缺乏排水设备时患积水。两航对机场跑道实施修补，跑道长度增加到1610米。

1947年，徐家棚机场拨为国民政府民航局所辖。考虑到武昌为航路中心站，根据国际民航组织议定标准，决定扩建机场，包括跑道加厚延长，添筑滑行道、停机坪、场内外混凝土交通道等，同时增设涵洞、水沟等排水设施。完工后面积达3000余亩。1948年7月1日，民航局将武汉空中交通管制站设在该机场。

武汉解放后，徐家棚机场由中央军委民航局接管，改作储存转运航空油料基地。1953年下半年，油库迁武昌南湖机场，徐家棚机场改作他用。

1943年10月1日，日军为加强空中力量，打通粤汉、平汉两条铁路线，在武昌青山镇白浒湾（魏家嘴）附近，勒令居民搬迁拆毁民房，征用良田5000余亩，强迫数千民工日夜修建军用机场，并导致3000



汪精卫（右）在武昌徐家棚机场

余农民流离失所。机场由武昌县伪保安大队负责安全警卫，日军负责施工。

1944年夏，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军分区所属鄂南指挥部与中共鄂南中心县委决定，尽快破坏日军修建军用机场，迫其停工。6月21日，武（昌）鄂（城）支队一个排及武昌游击队奇袭飞机场，打垮伪保安大队，摧毁一些建筑设施，迫使工程停工。

汉口第二机场位于汉口安乐乡第八保沙嘴余氏墩、慈墩一带（今属武汉市东西湖区），1944年1月开辟，占地900多亩，平坦低洼，除30%为公地外，其余征用民地。

1944年秋，日伪黄冈县政府指导官宫坂、县长罗荣袞选址仓埠（今武汉市新洲区仓子埠）东北的垄岗，北起孙家岗、西至高岗头，南抵柳西湾的细米塘，逼迫上万民众修建军用机场，意图运用空中优势随时机动兵力，支持清乡，以解其据点之围。同时，可备武汉机场被炸的应急之需。机场长1500余米，宽近300米，占地45万平方米，计填塘16口，挖祖坟近千座，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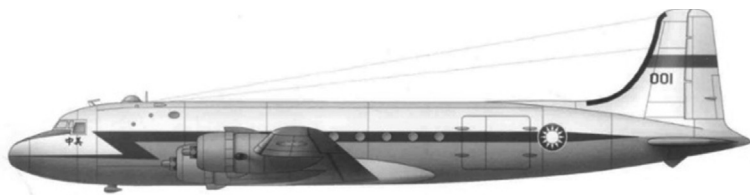
压耕地六百多亩。经多次请愿抗争，每斗田地才配给食盐10多斤。日伪勒令拆毁柳西湾，100多户人家舍身抗争，保住了家园。

机场修建征派黄冈、黄陂两县民工近万人，高峰期两万多人，从十四五岁青少年到年逾花甲的老翁。机场中部有一个10米多高的大土墩，据传是过去稔军进攻仓埠城时阵亡士兵集中埋葬的大坟墓。开挖时，3名民工猝死倒地，工地哗然。

1945年春夏之交，经一年多修建，机场平整碾压基本就绪，但未铺设水泥跑道，也没有导航及后勤等设施。伪湖北省政府派来一架飞机试飞验收，此后再无下文。抗战胜利后，机场之处复垦。

刘家庙民用机场胎死腹中

1945年11月，中航借款从美军在印度的战后“剩余物资”中购买C-47型运输机11架，随后又购买157架美军旧飞机。1947年，购买飞机DC-3型运输机6架。1946年起，将至少6架由C-54运输机改装为DC-4型飞机。1948年，再次购买最先进的被称为“空中行宫”的康维尔CV-240型客机6架。然而，武昌徐家棚机场不敷DC-4型、CV-240型客机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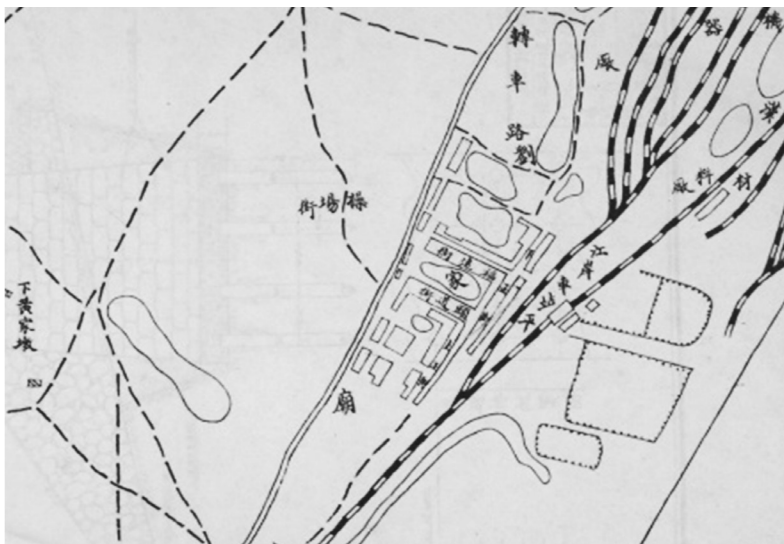
DC-4飞机实体图

1947年7月1日，国民政府将徐家棚军用机场永久性拨付给民航局使用，但民航局认为徐家棚机场作为武汉唯一的民用机场，尚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机场位置偏僻，远在武昌东北约6.4公里处，且远离江岸；汉口的客货邮件上下均横渡长江，运输存在一定风险，常有倾覆之忧；航空公司对于民航服务的效能，逊于机场设在汉口的情形等。为此，民航局筹划在汉口刘家庙新建民用机场，临近铁路，南靠长江，含沙地质，非常适合开辟机场之用。

此前1947年2月12日，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召开武汉三镇交通会议，确定道路系统及一些交通设施规划方案，提出“汉口王家墩军用机场靠近市区，建议改为民用，靠近市区部分土地划作市区发展之用”。

7月，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编制《武汉三镇土地使用与交通系统计划纲要》认为，“武汉现有机场三处，以汉口机场最大，拟已足应目前之需要。惟仅有一民用机场，且远在武昌之徐家棚以下，使用上至感不便”。为此建议设立民用机场，与民航局的想法不谋而合，最终推动另行选址新建汉口刘家庙机场的实施方案。

刘家庙泛指黄浦路至丹水池方圆三四公里的地带。相传王、黄、陈、刘四姓家族按人头集资，于1900年前后修建一庙，刘姓以人多势大称为刘家庙。1931年洪水破堤，刘家庙冲毁不存。此前修建铁路及车辆厂时，河南、福建两省筑路工人留此建房聚居，渐成河南街、福建街等小街陋巷，并辟有泥土小路直通汉口市区。



汉口刘家庙区域图

在场址完成测量设计后，民航局征用刘家庙附近土地2600亩，1948年改为1900余亩。此后时局巨变，刘家庙机场项目未能继续进行。

主要参考文献

- [1] 欧阳杰：《中国近代机场建设史1910—1949》，航空工业出版社，2008年。
- [2] 欧阳杰：《近代城市规划中机场选址及布局思想的演进研究》《城市规划的历史与理论3》，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
- [3] 柳凤珊：《修建仓埠飞机场的悲惨见闻》，《新洲文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专辑第3辑》，1995年。

刘宝森，武汉公交集团退休干部

我在汉正街长大（三）

◇ 李胜洪

杨家河辐射小商圈

杨家河是个热闹地段，也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它以杨家大巷连接河边码头为中心，辐射出一个不小的商业圈，周围店铺一个挨一个。那时，汉水河船来船往，码头上转运繁忙，行商坐贾来去匆匆，吆喝叫卖此起彼伏，幼稚顽童嬉戏打闹，繁华的市面就像一幅“清明上河图”，充满了汉味气息。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属于童谣“杨家河的伢们多，提着膀子摔上坡”中的一个，凭我的记忆还原那些早已消失了商铺。

许家压面铺紧挨着怡性茶馆，许老板年近四十，中等身材瘦瘦的，脸色白净。他家的面压得很筋道，生意很好，我经常去他家买水切面，回家做热干面或凉面。“文革”期间，压面铺停了业，但没想到1997年拆迁还建，与许老板住进了同一栋楼，成了隔壁邻居。30多年过去，他的模样变化不大，只是略显苍老，我一眼就认出来。

张友记肉铺在国光织布厂隔壁，是我

们这一带的猪肉供应点，每天的猪肉数量有限，要想买到肉就要早去排队，这个任务总是落在我身上。一般是头天夜里到肉铺门口，用砖头或破篮子占个位置，然后回家睡觉，到早上四五点钟再去排队。夏天问题不大，冬天就受罪了，顶着寒风站几个小时。有时排队的人多，插队的，装怀孕的（把小笊箕放在衣服中撑出个大肚子），总要扯皮拉筋几次。好容易等到猪肉拖来，首先看有没有猪下水（猪肠猪肺）和喉管肉、尾脊骨之类，如果有就选择买这些，因为半斤肉票可以买一斤。质量差一点不要紧，量多才是关键。

裕园杂货铺在杨家大巷对面，是我隔三差五要去买盐、打酱油、刮油胚（豆瓣辣酱）的地方。老式店堂，内空较高，宽阔却不敞亮，可能是临街的窗户较小，光线比较暗淡，显得阴冷一些。像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描写，曲尺柜台上陈列各种瓶罐，里面有各种酱菜。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玻璃罐内泡的形形色色的花红，听说有止泻功效。

杂货铺对面是豆腐铺，老板姓魏，年近

五旬，经营各种豆制品，有老豆腐和嫩豆腐之分。老豆腐是豆花在大模板内压的，压的时间长，整板豆腐较结实，作烧菜用；嫩豆腐也叫水豆腐，包布放在碗里，装好豆花后轻压成型，压好后一块块放在水中漂着，打汤或凉拌用。此外，门口豆腐架上还有千张、干子、千张筒、豆油棍（腐竹）和豆浆渣卖。他家的豆油棍货真价实，筋道耐煮不糊不散，口感好，不像现在造假的劣质腐竹，里面渗了雕白块，一煮就糊了。他家在工艺上也讲究，每锅豆浆煮沸后浮在面上的豆油凝固成形，揭起来就是豆油皮，晾干卷筒成豆油棍，一般一锅浆可揭三到四张，越揭越薄。豆油棍是制作素鸡、素火腿的主要食材，是吃斋人的至爱。我的祖母长年吃斋念佛，逢年过节就用腐竹、香菇、木耳、黄花煨个素汤，清香四溢，味道鲜美，丝毫不亚于排骨藕汤。

张少记剪刀店，店面整洁光亮。老板姓张，黄陂人，四十多岁，和我同屋住的张华是亲戚，所以熟悉他。此人性格开朗，喜欢说笑，生意也做得很好，公私合营后在日杂百货店上班。

夏家巷口车木店，路过时经常停下来看车工师傅车东西。他家设备很简单，一个架子式的木车床，有一个皮带连接的横轴。车工师傅坐在上面，双脚蹬踩皮带下面的脚踏，横轴就带着固定好木料飞速转动，师傅手中的车刀在高速旋转的木料上精心操作，随着木屑飞溅，粗糙的木料就变成圆滑精美的物件来。我对此感兴趣是因为要买他家车的陀螺（我们叫“得乐”），打陀螺是我小时候喜欢玩的游戏之一。麻线搓成的鞭子，抽打在陀螺上，看到陀螺在动态平衡的飞转中移动，那种感觉真的很好。不过陀螺的质量也有讲究，木质越坚硬做的陀螺越好，我们叫“稠得乐”，打起来特别带劲，和别人

斗陀螺时胜算就大多了，木质差的一碰撞就弹熄火了。

安定巷下首油伞铺，主要制作经营油布伞、油布雨衣、油布鞋和木屐。那个年代，一般人家多用油布伞，洋伞很稀罕（洋伞就是后来的克罗米绸布伞），而且也挡不了风雨，只能遮遮太阳。油布鞋多为中老年妇女雨天穿用，那时胶鞋还不普遍。我感兴趣的是他家做的木屐，木屐底下有四颗大铆钉，既防水又防滑，雨天尤其是冬天，可以把棉鞋套在木屐里。记得我读小学时，下雪天穿过木屐去上学。现在，油布鞋、木屐早已淘汰，油布伞也不多见，但我还是忘不了哦。

黄师傅理发到九十岁

庆新理发店在黄家北巷口的钱板巷对街，我只要在武汉，基本上都去那里理发。随着岁月的流逝，剪下来的头发由乌黑慢慢变成白发，那是时间的恩赐哦！这个理发店门面很大，设施也很好，两边对墙各有三把理发椅，六面宽大的镜子照得满堂生辉，理发工具琳琅满目。烫发机悬吊在座椅上面，烫发的妇女像戴了凤冠霞帔一样，几十根导线连接发卷和电加热器，利用电加热使卷着的头发成型。

店堂中央有两个大一点的煤炉子，放着脸盆烧热水，供刮胡子的师傅烫毛巾用。靠墙有两个供洗头的池子，热水由煤炉提供。那时候理发很讲究，除理发外，刮胡子、修面、提筋、掏耳，根据需要都可以服务。刮胡子、修面是理发师的基本功，技术含量很高。我年轻时就长了络腮胡子，第一次刮胡子就在这家，那是1968年，由于是第一次，印象特别深。

庆新理发店有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值

得一书，他就是黄文祥老师傅。黄师傅家居黄家北巷，1960年代中期就在这个店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个国营理发店，在时代转型中失去了竞争力，门面压缩，人员流失，黄师傅却留了下来。而且，他在1989年60岁退休后，还一人承包了这家小店，一干又是近30年。前几年我还看到他在店里忙碌，一张老式的理发椅，一面水印斑斑的镜子，一个烧蜂窝煤的铁炉，一把老式的电扇，一个九旬开外穿着白大褂的老人——这就是当时的画面。

来理发的多为中老年人，而且都是街坊熟人，边理发边拉家常，气氛融洽，市井味十足。老人家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7点下班，风雨无阻，节假日也不休息。我问他为何不带个徒弟，他摇摇头，叹息一声说：

“现在的伢们吃不得苦，没有人愿意学我们这些老手艺，即使想搞这一行，也都去发廊学那些花里胡哨的时髦东西。”

老人家从事理发行业达75年之久，退休工资也不少，完全可以安享晚年，但他从骨子里热爱这门手艺，这就是难能可贵的职业坚守。最近我又路过那里，发现门店关了，老人家可能真的退休了，留给人们的是难忘的记忆。

伢伢书摊和建乐卫生院

杨家河一带，沿街有几家伢伢书摊，有的摆在街头巷口，有的摆在临街屋内，我去得最多的是黄家北巷口的那家书摊。书摊老板姓王，高高瘦瘦的，脸上苍白无血色，总披着一件长褂，坐在一张条桌后面，给人一种有病的感觉，因此具体租书还书都由他老婆料理。老婆30多岁，做事麻利，喜欢抽烟，是个比较精干的人。

这家书摊设在裁缝店内，约占裁缝店的一半。店内有几条矮长条凳子，墙板上挂满伢伢书的封面。每到一册新书，就把彩色封面撕下来，贴在墙板上作广告，然后用牛皮纸代替封面粘订起来。价格看书的厚薄而定，一般是一到两分钱一本，一同去的人可以相互传看，不认识的人不许传看。如果租回家看价格翻倍，时间也有限制。我是那里的常客，每一本新书到来，我基本上都先睹为快，这可能就是书瘾吧！看书的钱主要来源于帮家里糊火柴盒子得到的奖励，有时也把过早的钱都看进去了。

伢伢书图文并茂，浅显易懂，受教育于故事之中，让我学到了课堂外的很多东西，积累了知识，启迪了心智，拓宽了视野，确实为日后走入社会打下一定基础。

建乐卫生院在汉正街有个门诊部，地址在汉宜里口，是我们这一带仅次于军工医院的卫生机构，科室比较齐全，承担附近工厂职工和居民的医疗保健和防疫任务。工厂职工生病，如果厂医务室解决不了，就会开一张三联单到卫生院来，只收挂号费。医药费计在三联单上，医院凭三联单与厂家结算。卫生院虽说规模不大，但医生的水平却不可小觑，有的医生是解放前的国民党军医，还有日军投降后留下的医生，医疗技术高明，每天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卫生院还负责疫苗的接种工作，每年的麻疹、流脑、脊髓灰质炎、结核病的疫苗，都由他们组织到片区小学接种。我的这些基础免疫，都是在四小完成的。

李胜洪，退休前任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印刷厂厂长